毛泽东思想在海外



【编者的话】

中共十八大召开之前，有关在党章中删除或修订毛泽东的思想的说法曾在外界流传，但事实证明："去毛化"的猜测并不成立。在新修改的党章中，科学发展观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与"三个代表"一道被确立为党的行动指南。

实际上，毛泽东的影响不仅长久地存留于中国，还撒播到了海外。本期周刊 1510 周刊关注"毛泽东思想在海外"。

"属于毛的时代早已结束，然而他对这个世界的影响却远未消失。"凤凰周刊的专题文章为读者梳理了毛泽东思想在全球各个国家的影响力和不同形态，从思想史的角度理解毛泽东给这个世界留下的遗产。回顾历史，从欧美到亚非拉国家，都曾燃起过毛泽东思想的燎原之火。由于周刊篇幅所限，读者可以通过文后的延伸阅读看到毛泽东思想在秘鲁、印度和美国如何崛起及其后续发展。

科幻作家韩松的文章通过对一位共产主义者兼科幻爱好者奥格里姆生平的介绍，为我们揭开了挪威毛泽东主义运动图卷的一角。程映虹的文章则详细记叙了毛泽东思想在新加坡由兴盛到衰退，最终导致新加坡左派失败的过程，让读者一览在那个火红的年代，在这个同根同源的国家上演的历史。而另一边，在同样属于华人社会的台湾地区，毛泽东曾经是一个被妖魔化的人物；但萧延中观察到，随着时间的推移，近年来台湾兴起了"毛泽东热"，毛泽东作为一个历史人物正在不断地被重新评价。

把目光拉回当今，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毛泽东思想的影响力正在逐渐淡化，对年轻人来说，那些曾经激动人心的口号甚至已经变得陌生。但有趣的是，在世界上仍然有很多地方，毛泽东主义正在复兴，特别是 2008 年金融危机之后，资本主义的缺陷越来越多地为人诟病，左翼思潮重新崛起，其中的毛派力量也不可忽视。对于在现代化过程中的饱经冲突、饥饿和剥削

的贫穷地区来说，毛泽东主义的影响更是前所未有。正如潘卡·米什拉所言：“对于这些扩张的全球化资本主义的受害者，毛主义不再无关紧要，而是重新成为富有吸引力的理论。”

本期周刊最后一部分，贾金玲的综述整理了国外学界对毛泽东思想研究的四个阶段。而 Andrew Ross 则从西方的角度，为读者分析了毛泽东思想的输出对西方文化政治的深远影响。

1510周刊由“我在中国”（Co-China）论坛志愿者团队制作，每周出版一期，通过网络发布，所有非一五一十部落的文章均经过作者或首发媒体的授权，期待大家的关注和建议。



目　录

在 Facebook 分享本期周刊

在 Twitter 分享本期周刊

在饭否分享本期周刊

在新浪微博分享本期周刊

在网易微博分享本期周刊

在腾讯微博分享本期周刊

在搜狐微博分享本期周刊

在人人网分享本期周刊

在 QQ 空间分享本期周刊

在豆瓣分享本期周刊



【遗】

7-1 黄章晋、欧阳斌、胡赉：毛泽东的世界遗产

“属于毛的时代早已结束，然而他对这个世界的影响却远未消失。”

在“马克思主义”的百年思想史上，毛泽东思想（Maoism）是唯一受到广泛认可的中国人的贡献。对于置身事外的人来说，没有了亲身经历的刻骨铭心，没有了官方意识形态宣传的干扰，他们所理解的毛泽东主义（思想）与中国人脑海中的毛泽东思想完全不同。

尽管一些不发达国家与地区的游击队或反政府组织给自己打上了毛主义的烙印，但这显然与真正的毛泽东思想是两回事，更与中国无关。正如中国驻印度大使孙玉玺曾说：“我们不清楚这些组织为何盗用中国领袖毛泽东的名字，而且我们也不喜欢这样。”

现实中，毛泽东所追求的“一大二公”，“消灭三大差别”等理念几乎不可能实现，但这毫不影响这些理念的感染力。更有趣的是，在人与人之间的差距空前缩小的互联网空间里，许多人正在有意无意地实践着毛泽东的思想，甚至有的还取得了空前的成功。比如代表 web2.0时代对传统商业观念最彻底颠覆的维基百科，因为其“集体创作”“自由”“版权共享”等概念，被称作“数码毛主义”。在西方人观念里，“毛泽东主义”代表着冲破一切先天或后天的不平等，以集体的乌托邦实现彻底的个人解放。

互联网观察家 Jaron Lanier 在《新闻周刊》上撰文指出，青年文化运动有两条并行不悖的线索：一方面强烈追求个性解放，一方面热切盼望集体认同。而毛泽东主义之所以在全球化大潮滚滚的今天依然能拥有众多的追随者，恰恰因为他是后一种线索最集中的体现。



在毛泽东逝世30周年之际，重新梳理毛泽东思想在全球各个国家的影响力，分辨出毛的思想在曼哈顿和安第斯山所体现出的不同形态，或许有助于我们从思想史的角度理解毛泽东给这个世界带来的变化。

毛死前曾这样评价自己的影响：“我只不过改变了北京附近很少的一些地方。”

那是1976年元旦，他接见了一对特殊的年轻夫妇：艾森豪威尔的孙子和尼克松的女儿。小艾森豪威尔说：“您的著作推动了一个民族，并改变了世界。”毛泽东对小艾森豪威尔的恭维并不领情，他转过头望着身旁的地球仪：“地球那么大，大得像个西瓜，怎么改变得了？”

这年的9月9日，毛去世。他的巨幅画像依然高挂在天安门城楼上，旁观着身后世界的巨大变化：中国完全放弃了阶级斗争学说，致力于国民的富裕，参与了世界经济一体化；毛预言中的世界革命同样没有发生，相反，一切似乎正朝着另外一个方向发展；东西方冷战结束，苏联帝国一夜之间瓦解，全球化浪潮席卷世界，国际资本不是诅咒和驱逐的对象，相反，令多数国家趋之若骛。

在告别了“革命理想”和“英雄主义”狂热后的中国，他被请下神坛，人们开始崇敬商业上成功英雄。但九十年代初，毛再次被请上神坛——以他最不喜欢的方式——他的画像成为中国汽车司机保平安的护身符；他的颂歌被最俗艳的电子乐包装后再次铺天盖地响彻在各个角落；小到钥匙扣，大到限量发行的金表都曾争先恐后地印上他的头像以促销；他被塑了金身的塑像再次热卖，供着不灭的香火，担任着保佑商人发财的任务。

九十年代的“毛泽东热”在中国完成了拜金时代最彻底的自我反讽。但进入二十一世纪，毛不再继续是一个流行的时尚元素符号，他一度被遗忘的乌托邦浪漫主义理想，在几十年经济高速增长后，重新被赋予神圣的光环：日渐拉大的分配差距与社会越发严重的公正问题，使越来越多失落的人生出对毛泽东时代的怀念和追忆。

属于毛的时代早已结束，然而他对这个世界的影响却远未消失。

毛去世30年后，泰森把毛的头像刺在自己身上，并恭恭敬敬前往毛的纪念堂瞻仰；美国总统布什捧起了《毛泽东传》并与德国总理默克尔交流心得；扛起今天全球反美大旗的委内瑞拉总统查维斯说：“我整个一生都是毛泽东的崇拜者。”

毛的巨大号召力，并非仅仅是“卡里斯马型”领袖拥有的超凡个性魅力，还来自他思想和观念的穿透力。“毛泽东主义”这个中国人陌生的词，曾在1960年代掀起过世界性波澜，1990年代转入低潮。但从西方校园里的左翼左翼师生，到亚洲、美洲山地丛林里的游击队，再到今日第三世界部分国家元首，毛的信徒仍遍布世界，虽然他们正逐渐被边缘化。“农村包围城市”、“彻底砸烂旧世界”这些新生代中国人完全陌生的口号，在互联网，在贫穷山村残破的墙上，依然被人不断重复，只不过它们不再是中文。

中苏论战与“毛泽东主义”的诞生

“毛泽东主义”（Maoism）这个词纯粹是海外自封的毛信徒们所创，而且毛泽东本人始终拒绝“毛泽东主义”这个标签。

催生“毛泽东主义”的直接契机是世纪六十年代的中苏大论战。大论战的导火索从赫鲁晓夫对中国的大跃进、人民公社说三道四就埋下了。苏共一度希望分歧不要公开化以免国际共运的分裂，但《人民日报》则认为“真理越辩明，马克思列宁主义越辩越发展。坏事开始变成了好事”。

公开论战，使得“毛泽东主义”逐渐清晰并定型。苏共认为建立全国政权后，应致力于劳动人民的幸福，而不是搞阶级斗争，毛主义则坚持不断革命论，不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会蜕变为官僚资产阶级专政，不搞阶级斗争，只管追求物质刺激，是资产阶级复辟；苏共认为社会主义国家要与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国家和平竞赛，要遵守国际规则，避免热核战争，毛主义则认为，绝不能与帝国主义妥协，不要怕战争，要勇于武装暴力夺取政权。

大论战最终变成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指导思想的正统性之争。全世界上百个共产党必须在支持中共或支持苏共间选择站队。当时执政的共产党中明确支持毛派的，只有阿尔巴尼亚共产党，非执政的只有印度尼西亚共产党。

中苏论战影响了社会主义国家对越南抗美战争的支援。因中国拒绝苏联提出的联合支援越南建议，亦拒绝苏联物资飞机过境、船舶靠岸，使原来亲中共的朝鲜劳动党和日本共产党公开宣布中立。日共一边谴责苏共的修正主义，一边抨击中国破坏的越南抗美战争。朝鲜报纸则以“不存在特别的马列主义的名家”否认毛泽东在国际共运中拥有特殊地位。

随后中国与阿尔巴尼亚对其他共产党的攻击则使这两个党在国际共运内部被孤立。

但是，在未获得政权国家的共产党中，毛主义并不缺乏支持者。他们干脆从党内分裂出去，由于他们相信毛的不断革命才“正统”，故在另组共产党时，加上“马列”或“毛主义”，但这些毛派共产党规模小而且边缘化。

“毛主义”的世界高潮

1967年1月13日，苏共总书记勃烈日涅夫在演讲第一次点名批判了毛泽东，并谈到了对文革的看法：“文化大革命是中国一切真正共产党人的悲剧，我们对他们深表同情。”

但在国际共运之外的世界，“毛主义”却随着文革的暴发传播开来。相比苏共历史上有过斯大林主义的残酷和斯大林后的霸权主义，神秘、激进、浪漫的毛主义无疑拥有更高的道德感召力。“毛主义”中强烈的反权威、反秩序观点，迅速点燃了整个西方世界年轻人身上躁动已久的反叛情绪。

1968年5月，一所大学女生宿舍严禁男生进入的禁令，引发了法国的“五月风暴”。学生举着标语牌，握着“红宝书”，走上街头游行示威。火热的罢课、大字报、大窜连使巴黎成为继续北京之后的第二个“革命的中心”。

“五月风暴”的顶点，巴黎有30座大学被占领、80万青年上街游行、300座工厂被占领、1000万工人罢工。法国瘫痪，戴高乐被宣告失踪。

虽然“五月风暴”中曾有数百辆汽车被焚毁，有5人死亡，但它是场真正的文化的革命。“沿着毛泽东指引的道路前进”的法国学生“要做爱不要作战”，没人打算组织游击队。“五月风暴”使法国从行为艺术到新电影流派、从结构主义到解构主义、从马克思主义到后马克思主义……每一种思潮都在运动中获得全新的发展。

日本“文革”显然更得毛派真传，在“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日本革命的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口号下，学生运动中的激进力量很快就发展出以武装暴力革命为手段的赤军。随后，赤军真刀真枪在世界各地干起了革命。

印度的校园“文革”于1970年春在加尔各答暴发。停课闹革命的学生除了抵制考试、砸毁学校设备、涂写毛泽东语录外，还掀起“砸毁塑像”运动：圣雄甘地、国父尼赫鲁和诗人泰戈尔的雕像都未逃过此劫。最后，印度每个塑像前都有警察站岗。印度学生“破四旧”时还顺带将甘地百年诞辰纪念中心的书籍和展物洗劫一空。

“毛泽东主义”影响的并非只有青年学生，西方左翼知识界名流也纷纷为毛主义站台。以法国为例，萨特、比托尔、拉康、阿拉贡等文化名流不但站在学生一边，甚至亲身投入到运动的第一线。

“毛泽东主义”也使那些过去仰赖酒精和大麻的西方摇滚乐手的愤怒和反叛上了新层次。著名的披头士乐队、滚石乐队均创作了大量毛主义的颂歌。

在帝国主义的大本营——美国，黑人民权组织“黑豹党”虽不被看成是共产党组织，但却从毛泽东的“反对阶级压迫，进行阶级斗争”中获得了精神指导。熟读“红宝书”的黑豹党创始人牛顿提出的策略是：“走群众路线，为人民服务”，另一位领导人福瑞德·汉普敦则坚信：“政治权力不是来自于我们身上花衬衫的袖子，而是来自于枪管子。”




在广大的亚非拉国家，人们更关注“毛主义”中“运用游击战、采取农村包围城市战略最终武装夺取国家政权”的思想。西方学生涌上街头时，他们辗转于美洲的丛林、穿行于喜马拉雅山的山麓、跋涉在伊洛瓦底江两岸的小径、挣扎在棉兰老岛的泥沼……

1966年至1968年，《毛主席语录》仅在法国就再版四次，印数高达几百万册。

1967年，西欧等国一批“洋红卫兵”不远万里访问中国，受到康生的接见，并参观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韶山。

“抬头望见北斗星，低头想念毛主席”，那是毛主义风靡世界的年代。

当毛主席握住尼克松的手

1972年，毛泽东与“美帝国主义的头子”尼克松握手言欢。这次握手导致了世界“毛主义运动”的第一次，也是决定意义的大分裂。

日本赤军骨干坂口宏在其回忆录《浅间山庄》中写道：“收音机中伟大领袖毛主席和美帝国主义的头子尼克松握手的消息，犹如空中爆响了一颗炸弹。”

据中国原驻阿尔巴尼亚大使范承祚回忆，中苏分裂后，中共将只有200多万人口的阿尔巴尼亚看成是“第一号朋友”、“欧洲的明灯”，中国在最困难时期仍向阿尔巴尼亚人提供了人均4000元人民币的援助。中美建交，阿尔巴尼亚公开发表文章，批判中共变成“修正主义”。

从美国共产党分裂出来的美国进步劳工党在“尼克松”访华后发表声明，谴责中共“背叛革命”，并开始着手修订自己的意识形态政策。

文化大革命的结束，标志着世界范围的毛主义运动高潮结束。

据一些资料披露，在中共审判“四人帮”时，秘鲁毛派共产党甚至对中国驻秘鲁大使馆进行暴力骚扰，对中共改革派领导人的攻击更是不绝于耳。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高放透露，阿尔巴尼亚共产党总书记霍查曾经一度试图打起“毛主义”的大旗，并在首都地拉那召集左派共产党，打出反对修正主义旗帜，试图组建“第五国际”。但因力量弱小，未能成功。

另据现在披露的一些研究资料显示，秘鲁光辉道路等组织也曾试图在文革后担当领导毛派世界革命的重任。

但是，随着1985年霍查的去世，世界再没有坚持“毛主义”的共产党执政。

西方那些曾热情满怀地走上街头的青年人身上的“毛主义”热情，是伴着青春冲动一起结束的。随着里根、撒切尔上台，保守主义风潮再度席卷西方世界，一场全球化的新变革出现在地平线上，这时的苏联终于耗尽了它的扩张动力，随后，柏林墙倒塌，克里姆林宫上空飘扬七十多年的镰刀斧子旗在寒风中缓缓降下。

伴随着国际共运的戏剧性巨大转折，毛主义走到了它的最低谷。

重新跳跃的毛派星星之火

然而，进入新世纪以后，反全球化运动的高涨，给国际共运，特别是国际共运中的毛派运动提供了新的机会。美国中央情报局前高级官员门格斯在2001年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在80年代至90年代初，许多国家的共产党都转向更为温和的社会民主派寻求支持。而现在，他们好像都回到了过去的阵线，甚至倒向更为激进的派别”。

门格斯继续解释道：“许多共产党组织依然活跃，但隐蔽在反全球化联盟的旗帜之下。”中央情报局的消息认为，在这些组织的背后，印度共产党（毛派）、朝鲜劳动党提供了大量的援助。

现在人们所掌握的资料并不能清楚地显示到底是哪些党派在背后援助 RIM 和 ICMLPO 这两个国际性的毛派组织，但这些组织的影响力确实在逐年增加。以 ICMLPO 为例，在第六届世界大会的时候，参加 ICMLPO 的政党为21个，到第七届世界大会时，达到了27个之多。

反全球化，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扩张”——在国际问题上，大多数的毛派组织与其他左翼组织并没有太大的差别。而在各国的内政问题上，各政党似乎都学会了毛泽东所倡导的“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本国革命实践的结合”。

在发达国家或其它政局较为稳定的国家，毛派政党坚持“群众路线”，支持劳工权益，甚至与其它左翼政党合作。如巴西和智利的毛派共产党，都是当地左翼执政联盟中的一员。

即使是发展中国家的毛派政党，在继续坚持自己的农村统治时，也开始学会与政府打交道。长期坚持斗争的尼泊尔毛派于今年6月开始与政府展开艰难的合作，而印度、哥伦比亚、秘鲁等各国的毛派组织都于更早的时候不同程度地与当局妥协，以谋求更为坚实的权力基础。

而在欠发达国家，毛派政党——更多的是毛派游击队，则坚持“农村包围城市”，“人民战争，游击战争”的思想，控制广大农村地区，与当局分庭抗礼。典型代表为：哥伦比亚依靠毒品生产和走私为生的毛派游击队；掌握尼泊尔农村大部分土地的毛派共产党；乃至更为赫赫有名的秘鲁“光辉道路”——红旗派游击队。

发达国家的毛派政党并不急于实现“武装革命”，这与“斗争环境”有关——很难拥有“根据地”并实现“武装革命”。但发达国家的毛派知识分子也没闲着，互联网时代终于给了他们实现建立自己根据地的理想。毛主义者纷纷在互联网设置论坛和网站，系统地介绍毛泽东思想和马列主义经典著作——ICMLPO 的官方网站列出了参与其会议的政党名单和会议报告，而革命国际主义者运动的网站则丰富得多，甚至还提供毛泽东著作的英译本下载，并不时发表声明，号召“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美国的另一个毛派组织——国际毛泽东主义者运动则忙于展开批判好莱坞电影的专项斗争。在他们的网页上，从《虫虫特工队》到《独立日》都在“揭批”的范围之内，他们毫不讳言这是在效仿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基本来自大学校园的国际毛主义者运动的理论家们坚信“外星人”由于比地球人“先进”很多，所以必然是“共产主义者”，所以《独立日》中所描述的外星人欺凌攻打地球人情节是“资产阶级的造

谣”，“实际上更可能发生的情况是：外星人来到地球，帮助地球人实现无产阶级的世界革命”。

这样的奇思妙想也在革命国际主义者运动2002年出版的官方刊物中出现：“世界革命”的核心与“新社会的曙光”将出现于中亚——中东地区，包括尼泊尔，巴基斯坦，伊朗，伊拉克等正与美国发生冲突的国家。

“毛主义”最令人惊奇的复兴，是查韦斯在委内瑞拉的崛起——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在委内瑞拉实现“毛主义”理想的信心，与石油价格一起猛涨。委内瑞拉在石油涨价的这些美好时光里，合作社已由1998年的800家发展到2005年的超过十万家，占成年人总数的10％委内瑞拉人加入合作社。

查韦斯在2005年召开的第5届世界社会论坛上，宣布要建立起“21世纪社会主义”。概言之，逐步消灭私有制、逐渐企业的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差别、逐步摆脱市场交换、改代议制民主为直接民主、用军民一体化改造军队——查韦斯最喜欢的一句话是“军队和人民的关系好比鱼儿和水”。

延伸阅读：

秘鲁的“光辉道路”：http://blog.ifeng.com/article/711821.html

复活的印度毛派：http://blog.ifeng.com/article/711818.html

星条旗下的“东方红”：http://blog.ifeng.com/article/711814.html

（黄章晋，《凤凰周刊》执行主编；欧阳斌，《凤凰周刊》记者；胡贲，时政记者，现斯坦福大学访问学者。原文链接：http://blog.ifeng.com/article/711827.html）。

【返回目录】



7-2 韩松：一个欧洲共产主义者和他的科幻乌托邦



"一九六八年欧洲的激进主义运动、美国的越南战争、巴黎和柏林学生暴动、美国的黑人解放斗争、苏联占领捷克斯诺伐克等这一系列的事件，使奥格姆憧憬着，在中国农民革命的激励下，挪威也爆发革命。"

奥斯陆文学屋的工作人员对我说，他们有一个很大的科幻收藏，并带我去看：在一间大教室一样的房间里，藏有三千五百多册科幻书。奥斯陆文学屋的负责人阿斯拉克告诉我，这些书是他的好友特朗·奥格里姆（Tron Ogrim）捐赠的。他已在二零零七年去世，时年五十九岁。在上世纪六十和七十年代，奥格里姆是挪威毛泽东主义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是挪威工人共产党（马列）的领袖。而阿斯拉克本人，在一九九七至二零零三年，也担任了该党的负责人。但这个党后来蜕变为社会革命党，与中国不再有联系。阿斯拉克后来在给我的一封信中，称奥格里姆是他的导师。

关于国际毛主义运动，如今在中国，可能只有在"乌有之乡"等少数网站上才能查到——那是上世纪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希望所在。至今，国际毛主义运动仍然存在，据说成员组织分布在美国、欧洲、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尤其是在菲律宾及南亚的孟加拉、尼伯尔、印度等有较大影响。

从小喜读美国科幻杂志

阿斯拉克对我这个来自社会主义中国的科幻作家十分热情，让工作人员打印了一份详细的介绍给我。根据这份介绍，奥格里姆成长在奥斯陆东部郊区的一个中产家庭，他的母亲是一位营养生理学家，父亲是物理学家，他们给了儿子很强的文化和政治养分。在三十年代，奥格里姆的父亲就是大学的马克思主义组织活跃分子，父母还都是二战时期挪威地下抵抗活动的骨干。

奥格里姆后来还经常热情地谈到他那参加过救世军的祖父对他的影响，特别是祖母，她与家庭脱离关系成为救世军的“难民营姐妹”。奥格姆从小时起，便是个无神论者。他从父亲的书架上找科学、政治和文学书读，特别喜欢读美国的科学幻想杂志。他说：“我的儿童时代的意识形态，是弗洛伊德、爱因斯坦和马克思。”

一九六一年，社会主义人民党在挪威创办，抗议挪威加入北约。奥格里姆在这一年加入该党时才十三岁。两年后，该党的青年组织——社会主义青年联盟创办，奥格里姆成了其成员。那时，他对中国对苏联的批判和毛泽东对第三世界解放斗争的支持产生了兴趣。他与学校同学一起，很快开始宣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希望青年联盟成为一个革命的共产主义组织。

一九六八年欧洲的激进主义运动、美国的越南战争、巴黎和柏林学生暴动、美国的黑人解放斗争、苏联占领捷克斯诺伐克这一系列的事件，使奥格姆憧憬着，在中国农民革命的激励下，挪威也爆发革命，这一想法当时很吸引人。在一九六九年，毛主席的“小红书”在挪威售出了两万六千册。

挪威共产党的领导核心

为了使自己的乌托邦思想更有吸引力和说服力，甚至变成现实可能，奥格姆展现了作为空想思想家的超凡魅力。他参加辩论，举行演讲，大量写作，很快，他被认为是毛主义运动的主要思想理论家。信奉毛主义的人在一九六八年后，在新的年轻左派中占了统治地位。在一九六九年，青年联盟从它的母党社会主义人民党中独立出来，建立新的马列共产党。在一九七三

年，工人共产党（马列）成立。从一九六七到一九八四，奥格里姆一直是这场运动的领导力量的核心。

挪威的毛主义运动，在七十年代是西方世界此类运动最强大的。在这十年的中期，整个挪威的毛主义运动，拥有五千名成员，其中三千人是工人共产党，都是“干部”，他们把大部分业余时间用在政治运动上。工人共产党创办自己的机关报《阶级斗争》，它在一九七七后成为日报，当时，党员们一年就汇集了两千五百万挪威克朗（约两千五百万人民币）用作出版资金；它有自己的出版社“十月”，有二十多个书店，分布在全国；还有录音公司，以及几个政治前线和组织；他们主导了大学社团。在五月一日示威游行中，毛主义者的动员力是社会民主党的两倍。

的确，挪威毛主义运动的影响是很大的。我回国后，在《人民日报》资料库中，也查到了有关报道。比如，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十六日《人民日报》报道《阶级斗争》报发表社论，欢呼毛选第五卷挪威文版出版。社论说，不学习毛泽东的著作，挪威工人共产党（马列）便不可能清算现代修正主义，并为建立一个列宁式的新的革命政党打下基础。没有成千上万的人们学习毛泽东思想并把它运用于挪威的阶级斗争，在挪威进行一场社会主义革命也是不可能的。

在这过程中，奥格里姆扮演着思想理论家和机构创始人的角色，他创办了《阶级斗争》报、十月出版社和录音公司以及其他一些组织。从儿时起，他就是个书虫，他很早就从中校辍学了，因为他的目标是一天要读一本书，学校满足不了他的需求。这些经历加上他的个人魅力和知识积累，奥格里姆在新一代作家中扮演重要角色。直到今天，毛主义者的在挪威知识分子和文化领域影响，仍是人们讨论的话题。

毛主义运动的相对成功，特别是他们在文化领域和大学的影响，在挪威历史和公共讨论中得到关注。一个原因可能是挪威的毛主义者，尽管代表的是输自外国的意识形态，并且主要从学生极端分子中吸收力量，他们却尽量与挪威的社会现实和政治传统联系在一起。从一开始，毛主义者就是实践导向的，总是寻找一条“动员群众”的道路。在六十年代，他们是越南抗争活动的领导力量；在七十年代早期，他们参与并支持了冲击斯堪的那维亚国家的非法罢工；七十年代中期，他们开始推行一个所谓的“党的无产阶级化运动”：使一千名党员放弃他们的研

究活动或者白领工作，而去到产业界打工。虽然大多数干部在几年后回到自己原来的领域，但它给了毛主义者以经验，加强了他们与社会现实的联系。几百名留下来的人，变成了高调的工会活动家和领导人。尽管如此，毛主义者从未在挪威工人阶级中获得足够的支持，对于人民来说，它仍然基本上活跃于高等教育界。但是这种极端的职业实践可能使得毛主义者比起其他西方的毛主义者更严肃、更有经验、更有组织性。

奥格里姆对于发展毛主义运动起到了关键作用。他推行的意识形态教育的目标，总是致力“把事情搞成”。在这方面，可以说他深受毛泽东的影响。奥格姆自己在酿酒业工作数年，成了工会的代表。

从乌托邦走向敌托邦

不幸的是，这一时期的成功，演变为了宗派主义，最后，导致了全面失败。在一九七三年的选举中，工人共产党仅得百分之零点四的选票，这对毛主义运动是重大打击。奥格里姆用极左方式进行回应，他发表了一篇内容紊乱的左倾机会主义文章。在其中，他宣扬党的无产阶级化，并宣称世界处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边缘，挪威将被苏联占领。以前的关于挪威革命的乌托邦式表述，现在被第三次世界即将来临的敌乌托邦预言代替了。新的宣示赋予党一个新的任务，要求它在迎接世界大战的基础上加强力量，但像大多数人看到的那样，它与挪威现实社会的大部分联系被彻底切断了。党进入了极度宗派化阶段。它为抵抗苏联占领挪威做准备，党员纷纷使用化名，党的三分之一的基地秘密化了，党在全国探挖洞广积粮，还对被认为是“卖国贼”的其他左翼党进行监视。后来，奥格里姆回忆这场运动，说，“这的确是我的风格。在坏的一面，尤其是。”

一九七六年毛泽东去世，使得国际毛主义运动以及工人共产党走向衰落（虽然这个党一直正式存在到二零零七年）。阿斯拉克给我的介绍是这样表述的：毛泽东去世后，四人帮——文革中最显赫的领袖，其中一人是毛泽东的妻子，被作为国家的叛徒逮捕了。这是对文革的一次

尖锐批评，也是对毛泽东的含蓄批评。几周后，毛泽东曾称之为欧洲社会主义灯塔的阿尔巴尼亚马列主义者，随着中国人一起破灭了。在此基础上国际毛主义运动迎来了一个毁灭性的危机，“科学的”意识形态和马列主义受到争论，有了不同的意见和中心。不久，工人共产党也遇到意识形态和组织上的危机，《阶级斗争》报和十月出版社几乎破产。在这种情况下，奥格里姆出版了他的著作《马克思主义——科学的或启示性的宗教》（一九七九年十月），他承认党对于中国和毛泽东曾经批评得太少（他写道：“我们是中国的应声虫。”），并认为现在到了开展符合挪威实际情况的社会主义政治运动的时候。但这本书来得太迟了，奥格里姆仍坚持他的信念：毛主义是科学的，并在大多数情况下是正确的。正如毛泽东说的，斯大林百分之七十是好的，百分之三十是坏的。他仍然支持柬埔寨波尔布特的“实验”。奥格里姆不能挽救这场他曾倾力倡导的运动，他自己成了他想要改变的思想的囚徒。几年后，这个党失掉了几千名成员，大多数欧洲毛主义党作鸟兽散，这也是挪威毛主义运动的衰落。

留下的遗产

在一九八四年，奥格里姆离开了工人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随后脱离了该党。他呆在了政治的外围，却开始了记者、演说家和作家的新生涯，特别是投身于新技术领域。他写了三本科幻小说，还开设了可能是挪威的第一个博客，在上面谈论他喜欢的话题。他说：“我是个松鼠！我找到了一个洞，在那里，我把我写的关于计算机、未来、学校、政治、经济、艺术和所有的一切放进去。”

的确，奥格里姆似乎对一切感兴趣，他不停阅读，并有很好的记忆力。他喜欢的书单，包括英语、德语、西班牙语、弗兰德斯语和世界语的书籍，从分类上有诗、犯罪小说、语言史以及超现实的后现代主义。但是值得一提的是，这个书单包括了大量的科幻小说。他称这个目录是他的自传。

阿斯拉克给我的介绍说：“他去世时留下了巨大的藏书。他的科幻书如今被奥斯陆文学屋

编目并陈列。这当然是对所有科幻爱好者的一份大礼，但它也是对我们所有想要了解而不是评判革命精神以及奥格姆试图创造的乌托邦梦的人的礼物。”

这次奥斯陆文学屋在挪威外交部赞助下举办中国文学周，专门安排了一场关于毛泽东的讨论，请了汪晖等人来演讲。他们赞扬了毛泽东的高瞻远瞩，称中国的改革开放，实际上应该始于一九七二年向美国打开大门。

阿斯拉克担任了主持，他回忆他小时候，父母都是左翼运动人士，他睡在床上，一睁眼，看到墙上贴的毛泽东的画像，百感交集。

我谈到了中国科幻，称中国宇航界考虑在太空中建立党支部，阿斯拉克非常激动，紧紧握住我的手不放。之后，他与我热烈谈论奥格里姆。

如今的挪威，成为了人类发展指数第一的国家：人均年收入达到四万美元；富裕程度在世界上名列前茅；它还是世界上有名的福利国家，几乎与人们“生老病死”有关的一切费用，政府都“承包”了。不少去访问挪威的中国人，都称之为“社会主义的天堂”。

（韩松，科幻作家。原文链接：http://www.guokr.com/blog/75870/）

【返回目录】

7-3 程映虹：毛主义和“文革”与新加坡左翼运动间的关系



“考诸史实，新加坡的左派盲目追随中国的“文革”，在意识形态和现实政策两个方面都推行了一条完全脱离新加坡社会现实的路线，从而导致群众基础的丧失。从这一意义上，说“文革”毁掉了新加坡的左派并不过分。这在当时的世界范围内绝非孤立的现象：在很多国家，以“文革”意识形态为代表的毛主义把本来可能通过合法途径或议会道路走向成功的左派推向极端，在经历了短暂的亢奋之后走向了自我毁灭。”

引言：“新加坡故事”与“文革”

“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千好万好不如社会主义好，河深海深不如阶级友爱深。”

这是“文革”时期一首人人会唱的歌，整个人类历史上还没有哪个政权在自我赞美方面能够达到这一高度。但是本文要介绍的并不是这首歌在中国大陆的传唱，而是它在新加坡的流行。

20 世纪 60 年代，就在中国大陆人人高唱这首歌的时候，在新加坡的一些幼儿园，五、六岁的儿童也在台上高唱“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唱完之后他们还跳“忠字舞”，表演“姐弟救亲人”的小话剧——剧情是年幼的小兄妹在玩耍时发现了受伤并被追捕的马来亚民族解放军战士，他们不顾生命危险把革命战士掩护起来，最后以参加土地革命，打倒地主阶级收尾。在很多当时的剧照中，可以看到儿童手舞红缨枪和木枪在毛泽东画像下高呼“枪杆子里面出政

权”的口号，雄赳赳、气昂昂地“冲锋陷阵”的情景。剧情介绍也用毛泽东语录来收尾：“军爱民，民拥军，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

这些儿童是在“新加坡社会主义阵线”主办的幼儿园里接受的“文革”教育。“新加坡社会主义阵线”是一个左派组织，深受毛泽东思想影响，实际上是马来亚共产党在新加坡的统一战线组织。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原来同属英国的马来亚殖民地，50 年代末 60 年代中期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分别独立后，马来亚共产党要参加中共“世界革命”的宏伟行动，在中共支持下不承认这两个新国家，认为是新殖民主义分而治之的阴谋，坚持武装斗争。60 年代马共的新加坡支部建在印度尼西亚，由马共领导人之一余柱业主持，当时印尼掌权的是亲共亲华的苏加诺，余柱业就从那里遥控新加坡的斗争。1963 年余柱业担任马共南方政治局书记（负责新加坡的工作），用周恩来为中共地下斗争制定的“十六字方针”作为马共在新加坡活动的原则，即：“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等待时机”。[1]当时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可以公开活动的“社会主义阵线”（以下简称“社阵”）实际上成为马共的前线组织，它退出议会，走上街头，在不拿起武器的前提下紧紧追随马共的路线。中共发动“文化大革命”以后，这个地区的左派力量深受鼓舞，认为这是世界革命高潮即将来临的标志，于是阶级斗争、路线斗争、造反、个人崇拜等“文革”意识形态和行为方式渗透到新、马两国的公开左派组织中，在这块被中国人称为“南洋”的热带土地上掀起了一股小“文革”潮流。当时和“社阵”一起组成新加坡左派阵营的还有规模稍小的新加坡人民党，加上很多左翼工团、职业工会、青年团体和文艺团体，很多大中学生以学生组织和个人身份参加了左派运动。

今天，虽然威权统治和一党独霸仍然给新加坡留下了实现民主化的重要课题，李光耀实际上的终身制和他的父权制的施政风格（即以政府和整个民族的家长自居）给新加坡的民族个性带来了消极的影响（用中国传统政治术语似乎可以称为“顺民”），这些特点使新加坡在国际上时被诟病，但不可否认，新加坡是摆脱殖民主义统治后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极少数国家之一，在短短数十年里就被联合国列为发达国家。新加坡尽管政治上没有实现民主化，但建立了廉洁有效的政府，实现了法治；给所有公民提供了充分就业和较高的生活条件（新加坡是世界上唯一一个绝大多数公民都拥有住房的国家）；社会秩序良好个人安全得到保障；环境整洁优美。在国际上，新加坡的良好声誉完全不依赖所谓的“综合国力”，充分证明“只有国家

强大了，人民才有尊严”的说教不过是无稽之谈。在这样的发展基础上，一个“新加坡人”的民族认同被公民普遍接受并引以为豪。

特别应该指出的是，多数新独立国家都以前殖民时期的历史和传统作为构建新民族主义的基础，但新加坡面临的情况完全不一样。新加坡在被殖民以前基本没有完整的历史和民族概念，所谓“新加坡人”和“新加坡民族”的观念完全是在 60 年代中期独立以后匆忙建立起来的。这样一个没有历史依托的国家，能够在短短的数十年间构建民族认同感并将其植入人心，其艰难比在政治上取得独立尤甚。反观很多第三世界国家，虽然民族早已独立，但人民难以产生引以为荣的民族认同感，困扰当今世界的大量的难民和移民问题就是例证。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的新加坡面临发展歧路。如当时一些观察家所担心或者希望的那样，它有可能成为“东南亚的古巴”——因为在马共影响下的左派势力在新加坡非常强大，他们推动反殖民运动的背后是要在新加坡建立亲共的社会主义政权。以李光耀为代表的民族主义者为了从英帝国主义下取得独立，曾经在 50 年代和 60 年代早期和左派结盟，其时正势如骑虎。但就在独立之后不久，新加坡政局发生了急剧变化，本来非常有希望主导政局的左派在短短几年间完全失去了曾经拥有的群众基础，不仅未获得掌握政权的机会，还丧失了在合法途径下作为在野党利用社会舆论和群众组织影响国家发展的地位。今天的新加坡有一些要求多党民主和公平选举的政治反对派，但却没有任何成气候的左派势力。

新加坡左派的结局具有独特的历史意义。“二战”后曾经在民族独立运动和社会改革浪潮中影响很多国家的社会主义和左派势力，后来大多数都失败或衰落了，导致这种结局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和形形色色的民族主义者的冲突，这种冲突常常伴随暴力和血腥镇压，在民族历史上留下一个难以理清的冤孽结。其中一些国家的左派上台，不但镇压民族主义者，而且消灭传统精英，改造知识分子，留下了更不堪的血腥记录。因此可以说，在很多国家，左派和右派的消失都是暴力的结果。但是，新加坡民族主义政党（李光耀的人民行动党）在左派退出历史舞台的过程中没有欠下一笔血债，它虽然独霸政权，把很多左派人士投入监狱，但没有判处一个左派人士死刑，没有一起肉体折磨的案例，也没有暗杀、绑架等行为，所有案例都依法解决，当



事人如果悔过和愿意出国，当局一概放行。可以说，英帝国留下的宪制和李光耀集团牢固的法制意识使得他们把和左派的斗争限制在法律的范围内。

那么，新加坡的左派是如何退出历史舞台的呢？左派历史学者常常归因于李光耀集团从英国殖民当局那里得到的支持，李的手段、策略和在法制范围内对左派势力的全面压制。例如新加坡政府以教育改革为名把教育的主要媒介由中文改成英文，大大削弱了以中文为主要传播手段、以华人为主要对象（新加坡人口绝大多数是华裔）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阵地。

新加坡官方历史有一个由李光耀本人阐述的从第三世界跃进到第一世界的“新加坡故事”－－这是他那两卷本回忆录的副标题。在这个“新加坡故事”中，李光耀承认，共产党和很多左派是全心全意为左派的事业而奋斗的人，很多个人值得他钦敬，但在取得独立之后，他们盲目追随北京的东南亚路线，不承认新加坡独立和新马分治的现实，认为这是新殖民主义分而治之的阴谋，完全不懂得新加坡人民到底需要什么。新加坡社会主义阵线在独立后的国会中占有 13 个议席（一共 53 个）、业已成为第二大党的情况下，其领导人李绍组却宣布“社阵”的议员退出国会，抵制宪制，“把斗争带到街头去”。“他从北京电台广播的新闻中得到灵感，决定仿效疯狂的中国文化大革命。当中国的红卫兵走上街头时，李医生（注：李的职业是医生）也下令新加坡的社阵支持者举着横幅和标语牌上街，在小贩和流动夜市等群众活动的地方示威，跟警察发生冲突。”正是这些行动显示了这个政治力量的本质，最终导致了其群众影响的衰败。回顾当初的情形，李光耀不无庆幸地说：“李绍祖不但使共产党统一战线变得无能，他实际上也把宪制舞台让给了人民行动党。那是个代价很高的错误，它使人民行动党在之后的 30 年在国会未受到挑战，占尽支配地位。”[2]

这个李光耀版本的“新加坡故事”离历史真相并不太远。这里的“并不太远”，不是说它对中国“文革”在新加坡的影响有所夸大，而是估计得很不够。一位当年站在李氏对立面积极参加新加坡左翼运动的研究者也指出：“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左翼紧跟这股激进思潮（注：中共的”世界革命“和”文革“意识形态），也以中国‘文革’的斗争形式，在新、马开展对内对外的大批斗。两地的左翼最终放弃宪制斗争的途径，走出国会，搞起所谓议会外群众斗争……奉行毛泽东思想，走的是极左的革命路线。”[3]考诸史实，新加坡的左派盲目追随中国的

“文革”，在意识形态和现实政策两个方面都推行了一条完全脱离新加坡社会现实的路线，从而导致群众基础的丧失。从这一意义上，说“文革”毁掉了新加坡的左派并不过分。这在当时的世界范围内绝非孤立的现象：在很多国家，以“文革”意识形态为代表的毛主义把本来可能通过合法途径或议会道路走向成功的左派推向极端，在经历了短暂的亢奋之后走向了自我毁灭。

一、因中国“文革”而极度亢奋的新加坡左派

新加坡左派报纸《社会主义阵线报》（以下简称《阵线报》）对“文革”作了最系统的介绍。该报是社会主义阵线的机关报，用中文出版，公开发行，每周一期，每期有15-20 页。根据社阵领导人之一林清祥 1962 年的报告，它的发行量当时是 18，000 份，而新加坡当时的人口不过 160 万人左右，应该说是一份相当有群众影响的政治周刊。[4]

1966 年 7 月 30 日，在“文革”正式展开一个多月后，《阵线报》对“文革”作了正式介绍。该报转载了中国作家代表团团长郭沫若出席亚非作家紧急会议时的讲话，说“文革”是一场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是一场挖掉修正主义祸根，保证红色江山永不变色的伟大运动。接著，《阵线报》用大量篇幅介绍了“文革”的发展，给读者描绘出一幅轰轰烈烈的伟大革命的情景。8 月 20 日和 9 月 20 日发表笔名为“大喜”和“向阳花”的系列报导“中国文化大革命”，完全照搬中国报刊对“文革”的描绘，例如“亿万工农兵、广大革命干部和革命的知识分子，正高举革命红旗，横扫盘踞在思想文化阵地上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横扫一切腐朽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文章还强调了这场斗争的紧迫性，说是“你死我活”，不但关系到“中国人民和国家的前途，也关系到世界人民和革命的前途和命运”。9 月 24 日的文章特别提到了马来亚和星洲（即新加坡）的“资产阶级报章”夹在“各国反动派、大小牛鬼蛇神的反华大合唱”中对“文革”发出“一声声反动嘶叫”，作者有针对性地说：“也许有人感到奇怪，被推翻了的反动阶级和右派势力，难道还有力量吗？值得这样大张旗鼓地斗

他们吗？也有人会说，一些右派知识分子，没有枪，没有炮，‘秀才造反’，成不了气候。”针对这种想法，文章照搬中国的“文革”宣传说：“问题不那么简单”，这些人的力量不但在“四旧”，而且都是“所谓‘名人’，‘学者’，‘学术权威’，‘专家’，容易迷惑人，他们在党政机关占据不少重要地位，有些部门甚至受他们长期把持，他们又往往打着红旗反红旗，把自己的真面目掩盖起来，以便暗中招降纳叛，组织反革命黑帮，进行反革命活动。”这些活动包括“让才子佳人帝王将相统治舞台”，因此怎么可以小看呢？“

“文革”开始后，在中国起冲锋队作用的“红卫兵”吸引了国际舆论的注意。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报纸，尤其是《南洋商报》，大量转载了国外的有关报导。针对这些报导，《阵线报》于 1966 年 10 月 1 日发表题为“中国红卫兵”的长篇报导。在北京发生“红卫兵”迫害、折磨和打死大量教师、学校管理人员和普通市民的“红八月”之后，这篇报导专门驳斥国际舆论对“红卫兵”的歪曲和攻击。文章说“红卫兵”是“文革的闯将”，“已经造成一个排山倒海、雷霆万钧的革命高潮……”，文章否认“红卫兵”暴力，说他们是“动口不动手”，因为“粗暴的对待只影响到皮肉，不能打入人心”。10 月 22 日《阵线报》又发表长篇报导“红卫兵的小故事”，描绘“红卫兵”深夜把迷路的老人接到自己家中照顾；拾到一分钱也要上缴；踊跃献血；从火灾中抢救工人；大量参加义务劳动等等。文章中还提到“红卫兵”向劳模时传祥学习掏粪，但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时传祥不久因为和刘少奇有关系被扣上“粪霸”的帽子遭受毒打，含冤而死。

随着“文革”的发展，左派报章对“文革”的报导也更全面和深入。1967 年元旦的《阵线报》全文转载了中共报刊的长篇报导“中国人民掌握了文化大革命的思想武器”。标志着“革命造反派”从“走资派”手中夺权的上海“一月风暴”开始后，1 月 15 日，《阵线报》全文转载了由上海《解放日报》和《文汇报》在 1 月 8 日联合发表的长篇报导“上海革命群众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发起总攻击”，并加了编者按，说“中国上海市发生的这一件大事标志着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一个新阶段”。另一份左派刊物《人民论坛》（半月刊）也在 1 月 15 日头版发表“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发展，上海革命造反派向资产阶级的反动路线发起总攻击”，说“革命造反派正按照毛泽东主席的教导，乘胜追击，把党内一小撮走资派揪出来，将他们斗倒、斗臭，象打落水狗一样，打得他们永世不得翻身”。

1967 年 2 月 26 日《阵线报》发表由“李”撰写的文章，题目是“从砸碎几个‘艺术’塑像谈起”，文章说：“据悉，去年 9 月间，中国中央艺术学院的革命师生，也在该学院的广场上，燃起熊熊的革命烈火，把那些佛像、佛龛和牛头马面，妖魔鬼怪，把那些希腊、罗马和中国的封建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塑像，统统毁掉、烧光。革命师生兴奋地说，我们砸碎烧光的绝不仅是几个塑像，而是整个旧世界。”文章说这是革命师生掌握了“不破不立”的原理，文章批判“文革”前中国的美术教育跟工农广大人民群众毫无关系，在这样的教育制度下教育出来的学生熟悉的是表现人体美，对劳动人民的形像却一无所知。1967 年 5 月 7 日的《阵线报》又及时发表了 5 月 4 日中共《人民日报》社论“知识青年必须同工农相结合”，预示了大规模的“上山下乡运动”。1968 年 8 月 1 日的《人民论坛》头版刊登关于建立“革命委员会”的“毛主席最新指示”，并全文转载中共两报一刊社论“革命委员会好”。中共“九大”召开后，《阵线报》甚至专门为学习“九大”政治报告开辟名词解释专栏。

为了显示“文革”的世界性影响，抵制对“文革”的“谣言”和“歪曲”，《阵线报》还大量报导和转载了“世界革命人民和进步力量”对“文革”的赞美。1967 年 3 月 19 日发表题为“世界人民赞扬中国文化大革命及伟大的毛泽东思想”长篇综合报导，列举了“刚果（利）革命委员会”机关刊物《革命》的文章、《巴勒斯坦之声》的广播以及希腊进步学联给中国的致敬电、“美国进步人士”发表的谈话等等，甚至象中共报纸一样杜撰外国人如何热爱毛主席的故事，比如 8 月 16 日发表题为“导航”的长篇报导，介绍了一个英国船长在危难中受到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海员援助，从此爱上了“毛主席著作”的故事。与此同时，《阵线报》还用大量篇幅刊登反映“文革”的照片和漫画。

新加坡左派对中国“文革”的了解和宣传源于中国的直接影响。当时除了通过对外广播和宣传“文革”，中国在香港的出版社和杂志社还把大量书报杂志寄往新加坡。中国的海员把“文革”宣传材料和货物一起在新加坡卸下。一艘名叫“海琥珀”号的香港货轮（船员多数是中国大陆派去的）因装载太多“文革”宣传品，新加坡海关不准中国海员登陆，也不准新加坡人上船。中国海员说这是法西斯迫害的残暴行为，于是把船身涂满“李光耀集团反华决没有好下场”、“强烈抗议新加坡反动政府的法西斯迫害”、“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坚决捍卫宣传毛泽东思想的权利”之类的口号，新加坡的左派学生和工人也到场声援，结果新加坡政

府只得让步，对接着到来的有大陆海员的货轮眼开眼闭。在左派宣传中，这是当时一场声势很大并取得最终“胜利”的“斗争”。当时新加坡是中国侨汇的第二大来源，仅次于香港，很多新加坡华人把钱寄回中国接济穷困的亲友，所以中国银行在新加坡设有分行，这家分行利用直接接触华人的机会在柜台上散发“文革”材料。最离奇的是，据《南洋商报》1967 年 9 月 27 日消息，在中国出口到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儿童零食橄榄包装纸中竟然也藏有毛语录和有毛头像的邮票。

二、新加坡左派隔海朝拜“中国革命之神”毛泽东

“文革”的主要产物个人崇拜也在新加坡以及马来西亚的左派中广泛流行。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政府都把毛著和相关“文革”材料（包括像章和邮票）列为禁物，违者罚款或入狱。据《南洋商报》1967 年 9 月 8 日报导，一名男子因拥有 31 本毛语录而须入狱一年。但实际上毛泽东著作、语录（小红书）、画像和像章在左派群众中广泛流传，难以制止。1967 年 12 月 17 日《阵线报》公开报导，援引“马来亚民族解放同盟”（这个组织是马共在中国建立的公开机构，不用共产党的名称，在海外遥控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革命）驻中国代表团的机关刊物《马来亚公报》的数据，在新加坡一地，每月就秘密售出大约 8 千份毛泽东语录，还售出了数以千计的毛泽东相片。印有毛像、毛语录的邮票被很多人收藏，因此“已经成为传播真理的一个普遍办法”。有些人甚至把毛语录印在纸币上，在市场上流通，以传播“革命真理”。背诵毛泽东语录和诗词也成为时尚。很多作者的笔名用的是毛诗词中的只言片语以表达对毛的忠诚和对毛著的熟稔。1970 年中共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把对毛泽东的赞美诗《东方红》的旋律作为卫星讯号传回地球，在人类历史上完成了一件无数帝王可望不可及的个人崇拜的伟业。在新加坡，一个左派诗人这样写到：“那是多么明亮的星啊/千颗星万颗星怎能相比/它闪耀着伟大思想的光芒/照亮了苦难人民前进的方向。……请你们倾听啊，倾听/那音乐的雄壮节拍/鼓舞着人民向前进/在宽广的宇宙里/它发出人类的最强音。”[5]

左派出版物在建立毛个人崇拜中起了特别大的推波助澜的作用，也是研究这段历史的人士了解当年对毛个人崇拜的主要来源。例如，1967 年 10 月 1 日的《人民论坛》在头版发表长篇社论，题目是“全世界人民仰望天安门上的红太阳－－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这份刊物 1970 年 1 月 1 日新年特刊的“特稿”题目是“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文章自问自答地说“为什么全世界革命人民不断地以最大的光荣、无限的欣慰、及革命的积极性和热情来书写、讨论及宣传毛泽东思想呢？”文章接下来一口气列举了七、八个“毛泽东思想是万能的”理由。

《阵线报》在推动人们对毛的个人崇拜上更是不遗余力。1968 年新年特刊的《阵线报》发表两篇赞颂红太阳毛的诗歌，其中一首是“在收音机旁”，描绘一家人无论清晨黄昏深夜都围在收音机旁倾听来自北京的声音，“‘东方红’的乐声一起/大家都屏住了呼吸/那是从毛主席身边发出的声音。……收音机啊，你可要争气，可别发出嘈音，哪怕是微微的短短的嘈音，来自毛主席那儿的话，我们一字都不能漏过啊”。诗中还说这家的 3 岁小孙女还在牙牙学语，“但是‘毛主席万岁’五个字，她念得比什么话都清晰！”

象中国在“文革”时一样，文艺演出也成为新加坡的左派充分发泄革命热情的渠道与占领意识形态阵地的手段，文艺演出中虚构的“革命”景象代替社会现实给左派带来短暂的亢奋和陶醉。每年的新春和各种节日，左派都大操大办，举行各种文艺汇演，在这样的演出中毛崇拜成为其主要内容。1968 年新春，“社阵”举办新年晚会，《阵线报》这样报导说：“红色的大幕拉开了，毛主席的彩色画像在背景上映现了。‘啊，毛主席！’‘毛主席万岁！’三千观众立即激动欢呼。大组合唱深情唱出‘万岁毛主席’这首歌”，接下来表演“使人耳目一新的”“语录舞蹈”，看了“等于接受一次深刻的毛泽东思想教育”，节目单上还有宣传毛泽东“造反有理”的相声，由一个青年向老汉宣传，最后让他接受毛的“造反有理”的教导。1969 年新春汇演中的毛崇拜更上了一层楼。除了红卫兵歌舞“祝福毛主席万寿无疆！”，“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即把林彪所写的“再版前言”配上音乐和歌舞），“毛语录舞蹈”之外，还有一个“欢腾的场面”：“演员们轻摇着手腕，使‘毛主席语录’象迎风的红花，同时又欢唱‘万岁！万岁！毛主席！”

左派人士还用毛语录与毛万岁的口号来“鼓舞”自己去“斗争”。例如，根据《阵线报》的报导，1967 年 12 月，当新加坡政府以“非法集会”罪判处 262 名“社阵”成员监禁 6 个月（这是当时的一件“大案要案”，被左派人士控诉为“法西斯血腥镇压”），被判的“社阵”成员和在场家属以及同志高呼“毛主席万岁”，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和“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语录歌，一路唱到监狱。宣传毛思想、散布毛像成为“斗争”的重要形式，很多人因为在大街或他人住宅外张贴毛像或语录，被警方以损害他人财产罪拘留，在罚款后获释。很多参与者是中学生——这种“斗争”方式和结果，今天看来有如一场闹剧，但当时新加坡的左派却如中国的“红卫兵”一样虔诚上演如仪。

各左派报纸每期都在头版大幅方框内刊登毛语录（《阵线报》始于 1966 年 11 月 27 日刊登毛的“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的一段语录），其内容与本期特定内容有关，例如 1968 年 3 月 1 日的《人民论坛》在头版发表文章“以昂扬的斗志迎接三八妇女节”，文章标题的上面是大幅毛泽东语录“真正的男女平等，只有在整个社会的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才能实现”；此外还大量刊登毛的相片；刊登或连载毛泽东著作（例如《论联合政府》就被 1972 年 1 月 30 日到 4 月 14 日的《阵线报》连载）；一度还有“林副主席著作选读”；尤其是发表于 1965 年 8 月的“人民战争胜利万岁”毛泽东诗词也大量被刊登——《阵线报》1967 年 1 月 29 日第一次刊登毛的“七律．冬云”和“七律．和郭沫若同志”这两首以反修和世界革命为含义的诗词；毛泽东语录歌的歌词和乐谱也大量被刊登，如“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1971 年 9 月 12 日），“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1971 年 8 月 29 日）等；左派报刊还大量刊登毛泽东语录画，即用通俗形像的画面表现毛思想，很多作品直接来自中国大陆；除此之外，左派报刊还发表大量学习毛泽东思想的文章，例如《人民论坛》1969 年发表连环画故事“小贩华叔掌握毛泽东思想坚决斗争的故事”，用 9 幅画面配上文字，很多画的文字说明都直接引用毛泽东语录——所谓“坚决斗争”是说这个香港小贩用毛泽东语录来和说他“阻街”，“摊子大”要赶他走或罚款的警察“斗争”，常常把毛泽东小红书拿出来挥舞和朗读，最后一幅画面是人民手挽手，头上是光芒四射的毛头像。

1968 年新年《阵线报》特刊发表“搞好出版工作，努力宣传毛泽东思想”的长篇文章，是把毛泽东个人崇拜和新加坡“革命”实际相结合的一个典型。文章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的胜利，标志着整个世界正进入一个以毛泽东思想为旗帜的新时代”，文章在回顾了上一年全世界各地的革命斗争后，声称它们“都灼灼闪耀着毛泽东思想的无限光辉。毛泽东思想已成为世界人民不可缺少的威力无比的精神原子弹……”。《阵线报》为了完成宣传毛泽东思想的光荣任务，在“过去一年中曾经三番两次努力加以改善，尤其是开辟了毛泽东语录专栏”。

1970 年 1 月 11 日的《阵线报》发表“马来亚革命之声”电台的长篇广播稿“马来亚共产党和它所领导的民族解放军（根据地建立在”反动统治薄弱“，实际是没有政权机构的马泰边境）大量翻译、翻印、出版和发行毛主席著作”，向新加坡左派介绍马共宣传毛泽东思想的情况。从 1966 年 7 月起，马共专门派人负责收听、记录毛泽东语录和“最高指示”，每收到一百条就出一袖珍本的《毛主席语录》，作为最珍贵的礼物送给指战员。他们在 1967 年 4 月收到由林彪撰写“再版前言”的毛语录后，于同年翻译出版，在年底分发给干部战士和其他人，分发仪式在除夕夜举行，成为一个隆重的场面。“战士们除了个别学习外，每星期还举行两次集体阅读。每天晚上睡觉前，部队战士以班为单位，结合班里出现的的活思想，选学一两条语录……部队还经常举行‘语录晚会’，进行背诵语录的比赛。”此外马共还收听记录了毛语录歌 200 多首，在根据地广泛传唱。除了中文，马共还用马来文出版了大量的毛著。

有一件小事或许很能反映新加坡左派学生的毛崇拜热和受“文革”影响的程度。1969 年新加坡一份杂志发表了一份读书习惯调查，结论是孙中山、李光耀、肯尼迪和毛泽东在大学生心目中名列前茅。《阵线报》迅即发表署名“一群学生”的来信“伟大领袖不容被侮辱”，说那份杂志是“乌烟瘴气的文坛”“抛出的又一本黑杂志”，是一棵“由一小撮‘大专’学棍所编，旨在向马来亚（新加坡）人民灌输反动思想毒素”——把毛和“臭名昭著、罪大恶极的李光耀”和“死于黑社会子弹下”的美帝头子肯尼迪排列在一起，“这是有计划的，决非偶然的讨好反动派的行径……我们要正告你们这批躲在臭粪堆里的学痞文棍，尽管你们挖空心思，竭尽一切诬蔑之能事，你们的目的是永远不能得逞的！”

可以说，新加坡左派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在表现形式上和当时被“文革”狂潮所席卷的中国相比，除了还没有出现用毛主席著作可以指导外科手术、毛泽东思想可以使聋哑人恢复听觉开口说话这类神话巫术之外，其余没有什么区别。

三、新加坡左派以打倒本国政府为己任的革命行动

在毛泽东及其追随者那里，“文革”绝不仅是一个国内的政治事件，而是所谓“世界革命”到来的标志和动力（有关论述见笔者“向世界输出革命——‘文革’在亚非拉的影响初探”[6]）。新加坡左派正是从这个角度来认识、宣传和接受“文革”，并把自己的“斗争”看作是以“文革”为中心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

新加坡人民党是在新加坡“社阵”之外另一个有相当影响的左派政党。以这个党主办的《人民论坛》（半月刊，公开发行）为例，1967 年 9 月 15 日它在头版刊登戴军帽的毛泽东头像，在显著地位刊登毛泽东语录“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并配发一副政治漫画：一个形象高大的革命者右手紧握“毛选”四卷，压住一群形象渺小、面目丑陋的国际反动派（包括新加坡的李光耀和马来西亚的拉赫曼），左手挥斥另两个帝国主义者。漫画下面是毛泽东语录“不管中外反对派如何猖獗（这种猖獗是历史必然性，毫不足奇），我们是能够战胜他们的”。这期杂志还刊登了长篇文章，题目是“把民族解放斗争进行到底！”文章说：“今天，东南亚的人民革命斗争正出现一片大好形势，一个伟大的、空前的革命风暴正在整个东南亚兴起。这个形势的最大特点，就是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思想正日益深入人心，正在东南亚的广阔土地上、海洋上传播！……我们马来亚（包括星岛，下同）革命人民正是在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思想指引下同英美帝国主义及其走过进行你死我活的革命斗争。不论在城市或乡村，我国的革命斗志，政治水平都大大地提高了，人民的觉悟也较过去有了很大的提高。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给予我国人民巨大的鼓舞和和伟大的指示。我国广大人民已经抛弃了‘议会道路’的幻想，认识到必须用革命的暴力去粉碎反革命的暴力，彻底打烂帝国主义支撑的拉曼、李光耀政权的国家机器，建立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的新国家！”

1968 年 3 月 15 日的《人民论坛》又在头版刊登长篇文章，题目是“东南亚国家联盟是美帝的反革命工具”。文章用典型的中国“文革”语言说：“不久前，美帝国主义在东南亚地区的两条臭名昭著的走狗——阿都拉曼（注：马来西亚领导人）和苏哈多（注：印尼领导人苏哈托）在雅加达举行了一系列的走狗会议，密谋反革命的活动。”这个活动就是建立“东南亚国

家联盟”。文章把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国名打上引号，表示根本就不承认它们是独立国家，并把“东南亚国家联盟”称为“新殖民主义的产物，是英帝伙同美帝拼凑起来的”。文章写道，“以李光耀这个老狐狸为头子的行动党也迫不及待地表示要加入”，“它那件早已破烂不堪的‘不结盟’外衣就连最后剩下的一点破布也掉下了。”

早在 1966 年 7 月 9 日，《阵线报》就全文转载中国政府 7 月 3 日就美国轰炸北越河内和海防、扩大侵略战争发表的声明，特意用声明中的一句话作为标题：“战争打起来是没有界限的”，暗示东南亚革命可以从中国那里得到最大的支持。7 月 23 日又在头版发表题为“朝向决战的东南亚局势”，描绘了一幅以越南战场为中心、以中共支持为后盾，遍及东南亚各国的反美反帝革命大好形势，给人以“决战”就在眼前的紧迫感，最后提出“身为东南亚人民一员的马来亚（注：在新加坡左派的政治术语中”马来亚“包括新加坡）人民，也必然会伴随局面的发展，更好地打击美帝国主义及本地反动派”。1968 年新年特刊的“搞好出版工作，努力宣传毛泽东思想”中又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卷动着历史的车轮飞骋向前，宣告了帝修反末日的来临，……马来亚人民尽最大的努力学习和应用毛泽东思想，宣传毛泽东思想，执行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的正确政策，推翻拉曼李光耀傀儡集团。”

所有这些都说明，在新加坡左派的政治意识中，他们的斗争是由“文革”所推动的“世界革命高潮”的一部分。“地球正在向左转”（《阵线报》1968 年 6 月 23 日），为了反映这个“正在向左转”的世界，从 1966 年下半年到 1972 年，《阵线报》基本上每期都有世界各地武装斗争、工人罢课或学生罢课的相关新闻或评论，并配发照片、政治漫画与图表等，介绍某地武装斗争的情况，例如战斗发生的地点、参与人数、消灭敌人的数量和缴获的武器弹药等等。1969 年 3 月 30 日的《阵线报》用整版篇幅刊登了“北加里曼丹人民武装”两年来的主要战斗和战果。此外，每年的新年特刊都有长篇报导，有时长达数万字，分地区、分国家详细回顾上一年“世界革命”的进展，并往往和毛泽东思想相联系。例如 1968 年新年特刊的文章题目是“毛泽东思想光辉照全球——1967 年国际革命形势综述”；1972 年新年长篇国际综述的标题用的是毛泽东诗句“冷眼向洋看世界，风物长宜放眼量”。《人民论坛》也大量刊登“世界革命”的文章，例如 1967 年 8 月 31 日第 1 版整版发表“武装斗争烈火燃遍亚非拉”，报导“世界革命”盛况。1968 年 7 月 19 日，《人民论坛》第 1 版整版发表题为“资本主义世界正在发

生‘大地震’”的文章，详细介绍西欧北美的学生运动、黑人运动和知识分子运动，强调“他们放弃了静坐、和平请愿等消极方式，而采取了罢工、罢课、占领工厂矿山、占领学校、逮捕和关禁作恶多端的资本家和反动学校负责人等革命性的步骤”；甚至“向反动国家机器挑战，以暴力反抗对付反动派的暴力镇压。……这一巨大的飞跃，……是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思想和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威力无穷的铁证。”

1969 年 1 月马来亚共产党在中国湖南省益阳市建立了“马来亚革命之声”电台[7]，用多种语言向东南亚地区广播，号召革命。这是毛主义当时在整个东南亚地区发动革命的一个重要步骤。新加坡的左派欢欣鼓舞，《阵线报》发表社论“革命力量进一步发展的标志”，宣告“一个红彤彤的马来亚（包括新加坡）人民共和国必将在不很久的将来光荣诞生。”此外还在“特大喜讯”的标题下将电台的广播时间、频率和波长刊登在报纸上，并不时更新。电台一建立，《阵线报》就组织了诗歌和漫画等稿件，如 11 月 3 日发表了三首诗：“倾听”、“听，马来亚革命之声”和“晴空中的巨雷”，说“北方传来了空前大喜讯”，“象长夜里/盼来了光明。象生活中/重逢远方的亲人”。在漫画上，经过丑化处理的李光耀、拉赫曼和身上写着“美帝”、“苏修”的丑角在一个高音喇叭的强力音波下惊恐万状地抱头鼠窜。“马来亚革命之声”建立后，《《阵线报》》和《人民论坛》常常大量直接刊登它的广播稿，尤其是反映武装斗争和世界革命的内容。笔者在新加坡时曾和一位当年马共在新加坡的成员交谈，了解到当时并没有其它渠道传送文稿，新加坡左派专门组织人重复收听广播，做速记，核对笔记，然后整理交给报社。此人当年就从事过这样的工作。

新加坡左派不但反帝，而且跟在中国后面“反修”，大力批判和新加坡社会现实毫无瓜葛的苏联，大肆宣传北京已经取代莫斯科成为世界革命的中心。苏联在 60 年代初展开了有关经济改革的讨论，主张重新考虑被计划经济严厉排斥的个人利益、利润和市场机制等。苏联这场讨论在社会主义国家历史上意义深远，是 80 年代改革的先声，但中共却认为这是资本主义复辟的标志。新加坡左派报刊也刊登了反映这一论战的内容，他们安排了这样一组政治图画表明中共和苏联的区别：在版面的上半部分是两幅中共宣传画，一幅是挂著毛泽东头像的火车头，文字说明是“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另一幅是光芒四射的毛泽东头像下中国人民手握“毛选”，意思是毛泽东思想是鼓舞中国人民的精神力量；版面的下半部分是两幅苏联政治宣传

画，一幅是一个挂著一个巨大的 1 卢布硬币的火车头，另一幅是一只手高举着 1 卢布的硬币，文字说明称，这是苏联当局“赤裸裸地宣传有钱能使鬼推磨”和“钱是带动一切的火车头”的反动思想。1968 年捷克发生要求改革和摆脱苏联控制的“布拉格之春”，新加坡《人民论坛》8 月 15 日（在苏联入侵之前）发表文章说“苏修，捷修货色一样”，不同的是苏修还要用社会主义的招牌欺骗人，而捷修连招牌都不要了，表明了新加坡左派反改革的立场。在很多漫画上，苏联领导人常常和美国领导人以及其他所谓“各国反动派”的头目被放在一起丑化。当时新加坡左派极力阻挠苏联和新加坡发展关系，有一个苏联舞蹈团来新加坡访问，新加坡左派号召抵制，要人民不去买票，不去看演出，并且高呼“苏修舞蹈团滚回去！”1967 年中共支持下在北京公开活动的“马来亚民族解放同盟”发表“打倒苏修、美英帝及其走狗”的长篇声明，无中生有地谴责“苏修”对“马来亚人民所犯下严重罪行”－－大概是因为实在缺乏证据，才没有用“滔天罪行”表达愤怒，它所讲的“罪行”无非就是苏联承认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独立并发展经济贸易关系罢了。《阵线报》立即全文转载这份声明。

在这种反帝、反修、反各国反动派（包括马来西亚和新加坡政府）的背景下，新、马左派在马共支持下一起制定了他们的国内政治路线：以“新殖民主义的阴谋”为名全面拒绝新马分治、各自成为独立国家的现实，将两国左派斗争视为一个统一的政治运动，用“马来亚革命”指称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两地的运动；将新马两国政府视为“帝国主义走狗”，不承认其合法性；全面抵制新马政府的一切法律法规和内外政策，不接受“马来西亚人”和“新加坡人”这种新民族认同，坚持“马来亚人”的概念。可以说，在 60 年代反殖民主义、争取民族独立和建立新民族认同的历史过程中，这是一条用毛主义取代民族主义、视本国运动为达到“世界革命”最终目标的一个手段、并以毛的中国和“文革”为精神寄托的政治路线。尽管左派和共产党人在推动新马独立的过程中有过贡献，但那并非其最终目的；民族独立不过是达到更高政治目的之手段，这从列宁开始就是非常明确的。“社阵”领导人林清祥 1962 年 10 月（新加坡独立前）就把这条路线阐述得非常清楚：“作为社会主义者，我们不否认，要实现社会主义的长远目标，不是短时期可以完成的。对于我们来说，现阶段的斗争是一项民族民主运动。”[8]

在这样一条政治路线下，“社阵”等左派从一开始就不会象民族主义政党（李光耀的人民行动党）那样满足于独立后的政治现实，一心一意地从事经济和社会建设，建立新民族认同，

而是始终以“外人”的心态视这个新国家为一个外在的世界性运动的一部分，服务于这个运动，甚至为这个运动而牺牲。从这个角度来看，左派和共产党人之所以推动反殖民主义斗争，并不是真的为了民族独立，而是向往“世界革命”。因此在民族独立后，他们决不会满足政治现实，参与国家建设；相反会以各种借口拒绝接受新的现实，同时发起新的斗争，从而成为政治和社会动乱的根源。当然，这样的分析并非要否定共产党和左派在推动民族独立过程中的贡献，而是意在回答一个关键的历史问题：为什么在推动独立过程中如此有群众影响的左派势力在独立后迅速衰落？

新加坡左派（“社阵”和人民党）采取了和新的民族主义政权誓不两立、毫不妥协的立场。1965 年 8 月 9 日马来亚联盟和新加坡政府同时宣布新加坡独立，脱离马来西亚，“社阵”和人民党当即于 10 月 8 日发表联合声明，表示不承认这个在英帝国主义操纵下产生的“假独立”，并向行动党政府发出三项挑战。8 月 21 日《阵线报》发表诗歌“枪尖上演的把戏”，极度夸张地说“新加坡在英国枪尖上独立”:“国防部长只懂‘向右转’，专心听从英国军官的指使（作者注：新加坡独立之初没有军队，政府要求英国军队留驻一段时间保障新加坡安全）；外交部长的头被扭歪了，只能朝西方点头称是；愚蠢的劳工部长白着眼说，移开枪尖工人会跌在地上饿死”。一年后，中国“文革”正式爆发，“社阵”9 名议员 8 月 10 日宣布辞去国会议员的议席，声称“大力开展议会外群众斗争！”“社阵”以后回顾这一决定时明确说这是“用毛泽东思想做指导，彻底批判敌人代理人和牛鬼蛇神及右倾机会主义散布的‘议会斗争’和‘议会选举’的荒谬言论和路线”，高举“议会外群众斗争的旗帜”，这就点明了中国“文革”和新加坡“议会外斗争”的直接联系。李光耀说左派退出国会“仿效中国疯狂的文化大革命”决非夸大，“文革”意识形态对“世界革命”的主要贡献就是批判“议会道路”，视议会道路与合法斗争为“叛卖”，主张直接行动和武装斗争，强调“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左派在斗争原则与斗争方式上也师法“文革”，凡是马来西亚和新加坡政府赞成的，左派就必然反对。这种完全的敌对常常以极度夸张的姿态表现出来。例如一个左派诗人这样形容新加坡：“这是生活在热带？天空没有太阳/生命没有光芒/人们的头顶/一片黑暗/人们的心里/一片寒凉”。对两个新独立的政府领导人，左派用种种方式丑化和妖魔化，大量使用谩骂和人

身攻击，“走狗”、“小丑”、“傀儡”、“困兽”、“奴才”、“匪帮”等侮辱性词汇充斥着左派报章并见之于标语口号，这种谩骂、丑化和人身攻击也随心所欲地用在其他人士身上，例如 1967 年 10 月 1 日的《阵线报》发表文章“丧家的走狗梁国光、沈秀宁”；1968 年 3 月 10 日发表了题为“批狗种卓贞佳”的文章，作者笔名是“杀千刀”。在政治语言上，除了“阶级斗争”、“革命”等传统词汇之外，更热衷于使用“造反”、“打倒”、“永世不得翻身”等“文革”用语；“加紧造反”、“造反有理”等成为报刊文章常见题目；此外左派报纸还发表大量“文革”风格的政治性漫画，例如，在一幅漫画上，新加坡总理李光耀和马来西亚总理拉赫曼的两个人头被丑化后压在革命的枪杆子下面，文字说明是对当时两个官方口号“马来西亚共和国万岁！新加坡共和国万岁！”的嘲弄，“万岁”的“岁”也都变成了“碎”，而且这两句口号在文字上被拆散，东一个字西一个字，表达了“分崩离析”的意思。根据《南洋商报》1966 年 9 月 3 日的报导，在新加坡影院里每当毛的形像在屏幕出现，很多观众报以欢呼；而听到新加坡国歌时则喝倒彩。这种亲华崇毛，对国旗国歌和国家元首不尊敬的情况在马来西亚华人中也大量发生。

这种夸张还特别表现在动不动就用“残暴”、“血腥”和“法西斯”等词汇来形容政府对左派运动采取的应对措施。实际上，如果这些左派真的了解他们所向往的中国当时正在发生的一切，如大量处决“现行反革命”和以“群众专政”的名义残酷迫害各种被认为有政治问题的社会成员等，只要他们还有起码的是非感和现实感，他们就应该庆幸自己反对的是一个如此仁慈的政府。从《阵线报》1970 年 5 月 30 日的一篇长篇报导中，可以看到当时左派行动的激烈和政府的节制。报导说，为响应毛泽东“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倒美帝国主义及其一切走狗”的号召，从 5 月 24 日到 30 日，成百上千的左派群众拉着大旗举着标语游行，不断呼喊“打倒美帝国主义！打倒拉赫曼、李光耀走狗政权！坚决不当傀儡兵！”等口号，把毛的声明和在新加坡拒绝征兵联系起来。在游行途中他们用棍棒袭击警察，打碎渣打银行的玻璃，警察因此拘留了一批人，因此被左派报刊称之为“法西斯暴行”。征兵是新加坡独立后建立国防的重要措施，也是民族独立的应有之义，但受到左派全力抵制。“社阵”主席李绍祖的儿子因为拒绝服役而被拘留，后交保释放但规定必须去服兵役，此人便选择出国。这件事当时受到左派的渲染，作为“斗争”的一个事件。

左派不但“杯葛”（英文 boycott ，意为抵制）选举和征兵这些政治措施，而且对政府的社会政策也一概否定，以“阴谋论”和泛政治化的心态抵制政府的一切措施。李光耀政权标榜“民主社会主义”，在发展经济的基础上强调社会服务和福利，改善民生。这种政策的性质和效果固然可以讨论，但《阵线报》头版发表评论的通栏标题是“李光耀的‘民主社会主义’就是彻底的法西斯主义”，一切都是为了外国资本家在新加坡的利润着想；在新加坡已经独立并大力吸引外国投资以发展经济的情况下，左派坚称新加坡的要务“并不是要如何进行发展，而是要如何驱逐外国统治和重新统一国家（即和马来西亚合并）”；为了治理空气污染，李光耀政府在 1970 年 3 月开始向喷黑烟的摩托车征收罚款，规定摩托车使用 5 年、汽车使用 10 年后每年必须车检，《阵线报》评论说这是一个“进一步迫害劳苦百姓”的“反动计划”，“李光耀傀儡政府不但用罚款来扩充其‘暴力机构’”，而且以通不过检查为名淘汰车辆，使帝国主义“生产过剩的车辆可以大量地在本地倾销，方便它们更大量地掠夺我国人民的血汗，这完全是为外国垄断资本家利益而制定的计划”，因此“黑烟毒，李光耀的心更毒”；李光耀政府制定了家庭计划，强调计划生育和小家庭对改善民生减轻负担的重要，《阵线报》发表评论的标题是“‘家庭计划’的目的何在？”，说这是“完全企图掩盖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剥削是造成广大人民生活贫困和痛苦的主要根由的事实，而欺骗和误导人民相信资产阶级的谎言，以为今天世界上人民生活的贫困，是由于所谓‘人口爆炸’和人民生育‘太多子女’所造成的”，“决定性的因素，不是家庭形式的大小，而是统治阶级的政策”；对政府发起的旨在解决华人社区常见的脏乱差问题的大众卫生运动、对随地吐痰罚款等，左派也一概拒绝，计算每年政府可以从罚款中得到多少去扩充“镇压人民”的暴力机器；教育部门号召教师以身作则，不去色情场所，也受到左派的嘲弄。

在国际共运和左派运动中，一个常见现象就是利用青少年的幼稚和反叛心理进行政治煽动，让他们从事和他们的年龄及自然身份不符合的“革命”，把他们推向政治斗争甚至暴力斗争的前沿。在这个意义上 60 年代的“红卫兵”运动不过是 30 年代的“红小鬼”的延续。受中共影响，新加坡左派运动的大量成员就是中学生，在中文教育和中文出版物的影响下，新加坡的华文中学一直就是传播中共革命思想的天然土壤，并形成了独特的校园政治文化，很多学生在校期间参加了革命组织和政治活动。新加坡作为英国殖民地，在就业方面，从英语学校毕业

的学生不但在语言上而且在实际知识和技能上比华校生有优势，这个现实因素更促使华校生对社会现实的失望和反感，增强了他们的“造反”精神。“红卫兵”运动一爆发，就在新加坡华校生中激起了反响。《阵线报》1968 年 5 月 12 日发表文章“马来亚的革命青少年们，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奋勇前进吧”，鼓动青少年起来“造反”。“文革”初期（1966 和 1967 年）华校生“造反”的具体行动，就是拒绝参加校方按照政府要求举行的升国旗、宣誓仪式和唱国歌，展开“反宣誓反升旗”斗争。他们不但在校园内展开“斗争”，而且走上街头，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这是整个左派对民族独立和新国家“不承认主义”、拒绝接受“国家意识”的斗争的一部分。在这些“造反”行动中学生不但和校方发生冲突，而且对“反动教师”采取了“革命行动”，即肢体暴力，类似于中国“文革”中的“学生打老师”。当校方和政府开除或逮捕（实际是短期监禁）一些学运积极分子后，造反学生称这是“法西斯血腥镇压”，又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反逮捕反开除斗争”，受到“社阵”、人民党、左派工团、校友会和艺术团体的声援。

很多参加这些“斗争”的中学生后来欲罢不能，等于放弃学业，走上了职业“革命家”的道路。但他们的很多“斗争”业绩说来并不真的“轰轰烈烈”，比如一个被开除的中学生因大骂校方“是李光耀傀儡政府的走狗”而被罚款 30 元（《南洋商报》1967 年 9 月 5 日）；一个少女因和两男子在他人墙壁上张贴左派大会广告被捕，罪名是触犯他人财物（未经屋主同意），法官判她有条件释放：一年内不得滋事（《南洋商报》1967 年 9 月 28 日）。当时几件涉及左派非法集会的案件，被捕者中有大量中学生，在法庭审判时旁听席上常常坐满家长。有的家长本人也是左派，他们大骂李光耀是“走狗”，法庭是“法西斯残酷镇压”，虽然所谓“判决”基本是罚款、短期监禁或有条件释放，丝毫不比其它国家对不法青少年的处罚严厉。20 世纪 70 年代初中共开始整顿城市中自“文革”开始后积累的青少年问题，很多“少年犯”在毫无正常法律程序的情况下被送去劳教，家长所能得到的不过是一纸通知书而已，哪有什么请律师和法庭旁听一说？

四、“克隆”文艺大批判和“革命样板戏”

“文革”的重要内容之一是文艺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占有重要位置，不但成为一条“战线”，而且用艺术的形式歪曲历史，虚构现实，不仅为政治目的服务，还提供了一个让左派陶醉的政治乌托邦。事实上，20 世纪的共产党革命所创造的就是一个乌托邦，而革命文艺就是这个乌托邦的最高最精致形式。在新加坡，“文革”文艺被完全移植过来。

1、中国文艺大批判的复制品：新加坡的文艺批判

新加坡华人本来就深受中国革命文化的熏陶，从“五四”运动开始，鲁迅、茅盾、巴金、郭沫若等左翼作家的作品在华文学校里广泛传播，左翼作家郁达夫 30 年代主编《星洲日报》副刊“晨星”，左翼文人胡愈之 1940 年受周恩来派遣应聘并担任过马来亚和新加坡最大的华文报纸《南洋商报》编辑主任。很多左翼戏剧也被搬上舞台，苏联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自 30 年代末开始就有两个译本在新加坡华人中传播。1949 年中共建国后，左翼文学在这里获得了更大的传播空间，革命电影、戏剧和文学作品拥有广泛的观众和读者。到了“文革”期间，新加坡左派文艺更是完全处于“文革”影响之下，其文艺思想、文艺批评和土产“样板戏”完全是中国“文革”模式的照搬。

文艺思想上，新加坡左派为贯彻毛“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之精神，《阵线报》从 1966 年 9 月开始举办《文艺笔谈》，1967 年 4 月《阵线报》的文艺副刊《新青年》发表长篇文章“当前我国文艺工作的若干问题”，以居高临下、指点江山、唯我独尊的毛式“文革”霸气为新加坡文艺工作者指出了“当前的任务”，规定了“为工农群众服务的方向”，强调了“文艺工作者必须坚持长期的改造”，确立了革命的“创作方向”，说要“大写、大演、大唱、大画、大歌颂工农群众革命运动”。文艺的创作手法也必须是“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文章把一大批新加坡和马来亚的华文作家打成“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说他们表现的是“个人主义、温情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坏思想。”

在确立了毛主义“文革”文艺路线后，新加坡的左翼文坛出现了一个“文革”潮，创作出大量歌颂“文革”和议会外斗争的文艺作品，甚至无视政府的法令，公开号召展开武装斗争，响应马来亚共产党游击队“乡村包围城市”和“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号召，“突出民族解放军战士的英雄形像”。有人记下当时盛况：“左翼文团，杂志，戏剧团体等纷纷高喊为人民服务的口号；小说，诗歌，戏剧，文论等纷纷‘变色’，左翼文坛一时间红旗飘飘，枪声卜卜，‘文革’味十足。”[9]《阵线报》每年的新年特刊除了发表党领导人的新年讲话、世界革命形势回顾之外就是发表长篇文章，对过去一年的文艺作品从“文革”意识形态的角度品头论足，例如，1968 年的新年回顾题为“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在文艺战线上冲锋陷阵”，毛的那句“有错误就得批判，有毒草就得进行斗争”更是被奉为宝典。此外，大量气势汹汹、蛮不讲理的文学大批判文章接连问世，锋芒直指那些非政治性的文学作品。所有讴歌自然和人性的作品，一概被贴上“黄色文学”和“殖民地文学”，至少是“无病呻吟”的标签而被批判，其用词之刻薄和恶毒，堪与中国“文革”相比。一篇批判诗人黄怀云的文章这样写道：“黄怀云的《流云的梦》是一株毒草，是一部反现实主义的歪诗，……是一小撮文娼文氓以‘诗人’的画皮去害人作恶”。另一篇文章说：“文坛小丑赵戎又活跃起来了！……这种苍蝇，伪装君子、假冒英雄，整日嗡嗡营营，诋毁正直的人们，无论怎样干净的东西，总喜欢拉上一点苍蝇屎”。“文妖、文娼、文氓”、“渣滓”、“黑书”等用语在这类文章中触目皆是。60 年代末现代派诗歌传入新加坡，左派立刻发表文章说“妖气弥漫的马华文坛又吹起了一股歪风”。

在左翼阵线内部，很多“自己人”也难逃被大张挞伐的命运。一个著名左翼文艺批评家忠扬被批成“逃兵”和“周扬文艺黑线”在新加坡的“忠实信徒”；其他一些作家不是“对阶级斗争的概念还很模糊”，就是“小资产阶级思想非常浓厚”；有一个左派诗人写了一首题为“挽歌”的文章悼念一位去世的同志，结果受到了严厉的批判，说他没有表现出烈士的气概，是别有用心。有时候左派报刊也会发表被批判者的自我辩护或者同情者的文章，但那和中国的“文革”一样，往往是下一轮更深入的“批判”的前奏。

2、中国“文革”样板戏的“克隆”：新加坡左派的土产样板戏

作为"文革"文艺代表作的样板戏在华人世界中产生了很大影响。新加坡毛主义左派控制下的金银业职工联合会将《红灯记》改编成话剧于 1969 年公演，并公开宣布这是"为了歌颂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取得决定性的和伟大的胜利，为了宣传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以及为了我国当前政治斗争的需要。"左翼文艺工作者还仿效"文革"的做法，组织了"文艺轻骑兵"，在乡村郊区搭舞台演出，把革命文艺直接送到群众当中。他们还利用各种群众团体的联欢会，学校的毕业典礼，甚至幼儿园的结业典礼上演"文革"类型的文艺节目。

仿效中国样板戏和"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新加坡左翼文工团创作了三个大型演出项目：音乐舞蹈史诗《歌唱马来亚》，诗歌造型《抗日之歌》和诗剧《送军粮》，被当地人称为"土产样板戏"。

《歌唱马来亚》的主题是歌颂马来亚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斗争。由于新、马两国的共产党和左派在组织和行动上一直密不可分，歌唱马来亚的共产党也就是歌颂新加坡的左派。这个节目模仿《东方红》，把共产党歌颂成"人民的大救星"，唯一重大的不同是《东方红》以神化毛泽东为中心，而在马、新两国的共产党和左派组织中则还未形成这样的个人崇拜。这个音乐舞蹈史诗载歌载舞，用多种艺术形式歌颂马共 20 多年的武装斗争。据观看者介绍，"序幕以战鼓和欢呼，展现气势磅礴的场面，红旗招展。舞台上工农兵学以战斗姿态朝著红旗所指的方向前进，展现出一幅'文革'式的舞蹈构图"，节目中有一段直接根据"文革"时毛泽东语录歌"造反有理"编排的同名舞蹈。尾声是大型歌舞"大海航行靠舵手"，这是一首"文革"时最著名的毛泽东颂歌。1969 年 4 月 27 日《阵线报》发表长文介绍"土产样板戏"时这样描绘："舞台呈现出东风万里，红旗漫天的伟大场面，让人不禁欢呼火的旗，火的海，毛泽东思想的新时代。"

笔者在新加坡访问期间虽然没有机会再看到这"土产样板戏"，但有幸听到了《歌唱马来亚》的主题音乐"我爱马来亚"，一听就明白这是完全照搬 60 年代一首大陆歌曲"我爱我的台湾岛"。这本是一首台湾民歌，被共产党重新填了歌词。这是共产党革命文艺对很多民间音乐作品实行"共产"的典型做法，如"东方红"的旋律原来是陕北情歌。通过这种文艺"共

产”，无论共产党的革命口号多么荒谬离奇，立竿见影地就“为人民所喜闻乐见”了。根据有关材料介绍，原来这一文化移植是由从中国归来的马共成员所完成的。

第二部土产“样板戏”是诗歌造型《抗日之歌》，强调马共遵循毛泽东“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教导，“领导”了东南亚抗日战争。马共虽然为东南亚抗战作出贡献，但毕竟和美英等主要盟国的正面作战无法相提并论，但在这一点上，马共和中共的做法如出一辙，在讲抗战时，马共的介绍给人造成抗战全是它在打、马来亚是它解放的印象。这个节目采用了中国《红色娘子军》和交响诗《嘎达梅林》的片段，被左派评论家称为“一部革命化、民族化、群众化的好作品，是红色文艺工作者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的成功作品。”

第三部土产样板戏是诗剧《送军粮》，描写马共抗英战争中的军民鱼水情。第一场是“突破火线送军粮”，第二场是“解放军来了”，第三场是“奔向民族解放的战场”。当时有两个笔名叫“霜天”和“宣红”的左派评论家——“霜天”来自毛泽东诗句“万木霜天红烂漫”，而“宣红”即“红色宣传”的意思。他们在一篇“红旗如火，星火燎原”的评论文章中说这个节目“体现了‘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的主题思想，歌颂了毛主席关于人民战争的理论，歌颂了马来亚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马来亚民族解放军”。

当时新加坡积极吸引外资，发展工业，因此也产生了一些劳资矛盾。左派文人紧跟中共“文革”文艺的模式，主题先行，创作了大量“工人小说”，不但把劳资矛盾上升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而且虚构出一部由英雄人物领导工人阶级反抗资本家的阶级斗争叙事。长篇小说《金光道上》描写一个名叫清坚的主要英雄人物：“他拿出一本红皮小册子，开亮了台灯，坚持每晚的学习工作。这时，将近午夜了，宿舍外正下著倾盆大雨，寒风不断吹进房里，同房的几位工友已经呼呼入睡了。清坚轻手轻脚，把被窝盖在他们身上”——这样的场景完全是中国革命小说的拙劣模仿。结尾通过“正面人物”雅娟的直白，表达了要前往马泰边境参加马共武装来解救新加坡受苦受难的工人的信念：“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为了加促人民事业不断向前发展，我决心作出更大的贡献……让我们在祖国的远方——在战斗中重逢！”

1970 年，由于新加坡国家建设成功，“革命”越来越不得人心，左翼面临困境和内部分裂。左翼作家和评论家黄兴提出了“革命文艺马来亚化”的主张，试图矫正自 1966 年以来革命文艺“文革”化的极端趋势，用“马来亚化”对抗“文革”化。所谓“马来亚化”即是强调“马华文艺”（即马来亚和新加坡的华文文艺）的独特性，这一独特性在现阶段应该是“爱国主义”，这个主张受到著名革命作家凌远的支持，他婉转指出，“外国革命文艺所反映的，是外国的革命具体情况，和马来亚（包括星岛）工农兵的生活不能符合，和实际斗争需要也有着一大段距离。”然而极左文人“集言”发表“突出无产阶级政治，为工农兵服务”的批判文章（《阵线报》1970 年 10 月 11 日），指出“革命文艺马来亚化”的口号“并不能突出无产阶级的领导权问题，并不能概括当前历史阶段所要解决的迫切任务是革命文艺创作同武装斗争的深入发展相配合”，强调“要无限忠于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文章还说，在 50 年代末期革命文艺曾经“提倡健康文化，打击黄色文化”，脱离了政治斗争大方向，犯了“修正主义”的错误；今天要吸取这个教训，抵制新的修正主义口号，坚持“革命化、战斗化”反对“马来亚化”。

五、“文革”和新加坡左派的分裂

20 世纪 60 年代末期，鼎盛一时的新加坡左派开始衰落。

1970 年李光耀访问苏联，其时正值中苏对立严重。苏联总理柯西金问李光耀，新加坡的毛主义者究竟得到多少支持？李光耀回答说，在 60 年代上半期大概有三分之一的新加坡华人（新加坡人口中绝大多数是华人）支持左派，现在则大概有 15%.[10]

但这样一个强大的左派阵营却并没有使左派在新加坡独立后的政局中发挥重要作用，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左派的分裂和内斗。分裂和内斗一向是国际共运的特色，因为共运的本质就是用革命和暴力手段追求政治权力，用理想主义和乌托邦主义掩盖极度膨胀的权力欲。在一个有着正常社会秩序的社会里，这种膨胀的权力欲无法一蹴而就，权力追求者只能通过正常的升迁管

道慢慢爬升，而且最终不一定能够达到权力的顶点。因此，通过投身彻底否定现存制度的政治斗争，就成了他们实现权力欲的快速通道。毛主义和毛主义支配下的“文革”把共产主义运动这一本质推向极端，“有权就有一切”成了可以公开宣示的政治目标，“路线斗争”成为争夺权力的幌子，最后终于发展到毛泽东对党、对国家权力的垄断与独霸，甚至把全国置于军管之下。毛发动“文革”、“造反”，其本质还是夺权，为了消除他感到的失去权力的威胁。毛主义的这种恶俗不但在中华民族中种下了至今仍清晰可见的恶果，而且随着中共国际影响的扩大发展到海外，于是世界范围内就出现了中共造苏共的反，即所谓“中苏论战”之事。20 世纪 60－70 年代在国际共运和左派运动中，中共影响有如癌细胞，其扩散之处，左派内部肌体无不发生恶性病变，出现分裂、斗争和“造反”，或以亲北京和亲莫斯科分界，或以谁更亲华更崇毛分界，比赛激进，比赛革命，有时一个党或一个运动不但一分为二，甚至一分为三、一分为四。就连所谓“亚非作家协会”也分裂成亲华和亲苏派，前者以北京支持的“亚非作家常设局”为主，谴责后者“非法召开伪亚非作家大会”（1967 年 3 月）。在资本主义危机和民族独立运动中产生的社会主义和左派运动本来可以有充分的发展余地，但其结果往往是自我毁灭于内部分裂。新加坡的左派运动就是一个例证。

新加坡左派严重的分裂始于 1965 年新加坡独立，因为独立给左派带来了是否承认独立、以及如何处理和新成立的民族政府的关系等问题。新加坡左派的主流从一开始就确定了“不承认主义”的立场，此后主要是比赛谁反对现政府更彻底、更不妥协。但是左派内部并非铁板一块，一些比较现实理智的左派认为，不能因为这一独立是民族主义者通过妥协和谈判达到的就拒绝承认，主张观望。对于左派内部的这种意见，《阵线报》1966 年 7 月 23 日在发表“朝向决战的东南亚局势”一文的同时，发表了一篇“坚持正确路线奋斗到底”，说上述意见不同是“坚持正确斗争路线的社阵、人民党以及广大工会的干部与群众，和那些有意散布错误路线的人士之间的分歧，是要使斗争走向胜利与企图将斗争引进死角的两条路线上的分歧。”在提出“路线斗争”的同时，文章还提出“反动派及其在左翼内部的代理人”这样一个充满“文革”色彩的概念，为党内斗争“上纲上线”作热身准备。

进入 1967 年，对左派内部不同意见的清算以“文革”方式和中共党内斗争的方式出现，例如，1967 年 5 月 7 日《阵线报》》报导了在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五一”大游行，说“今年

的‘五一’是在左翼胜利地批倒了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扫除了敌人代理人、黑帮分子、牛鬼蛇神的情况下到来和过去的”；8 月 20 日《阵线报》发表“社阵”和“缝业”（缝纫行业左翼工会）联合声明，“严厉谴责一切牛鬼蛇神，和谢启英这一小撮反工会、反党、反左翼、反人民的反左翼分子划清界限，坚决地暴露他们，孤立他们，打击他们，把他们扫出左翼队伍，……我们呼吁一些被误导的工友和干事，……坚决与谢启英等反左翼分子划清界限，站到革命人民一边来！”这是左派阵营内部第一次比较重要的分裂，从此之后，内斗不已。

1968 年，中国“文革”中的内斗之风蔓延至新加坡“社阵”。5 月和 7 月《阵线报》接连发表“打倒派性团结对敌”和“再论‘打倒派性团结对敌’”的文章，点了一批“钻进左翼内部的阴险敌人”的名，呼吁“所有受一小撮所谓‘华中领导’、‘文序’、‘光睦黑帮分子’、‘金银业领导’、‘茶餐领导’等黑领导所误导的干部、同学、工友，猛醒过来，不要被敌人扭转了革命斗争的大方向”。其中最重要的“斗争成果”就是粉碎了“社阵”裕廊支部（“社阵”的一个主要支部）内以王理谊为代表的“反党势力”企图篡党夺权的阴谋。在“社阵”总结粉碎“王理谊反党集团”斗争胜利的经验中，很重要的一条是“政治串连”，就是各支部展开大串连，交流和反党分子做斗争的经验，揭露他们的真面目。这和“文革”时期“红卫兵”和“造反派”的大串连非常类似，连用词都雷同。但王理谊究竟有什么具体的“反党”罪行呢？说来可笑，事情的起因不过是党办幼儿园的教师续聘问题。主管幼儿园的党执委会要换教师，部分党员和家长不同意，“反党分子”于是散发“告家长书”，主张将现有教师延聘 3 个月，结果出现一个班级有两个教师（一新一旧）在课堂上争夺学生的情况。这一争执本来不过是“茶杯里的风波”，但当时“社阵”党内矛盾尖锐，矛盾的两派借机上纲上线，成了“路线斗争”。

新加坡左派最主要的分裂发生于 1969 年以后，主要原因是社阵领导李绍祖提出“马来亚重归统一”的口号。自 1965 年独立后到 1969 年，新加坡政府通过发展经济和加强国际联系基本确立了合法性，获得了广泛的国际承认，因此左派领导的“不承认主义”越来越不合时宜。为了摆脱政治困境，1969 年 6 月“社阵”党主席李绍祖发表长篇文告，提出“马来亚重归统一”的口号，并引用毛泽东“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的语录来为自己撑腰，用中国大陆和台湾要统一，南北越、南北朝鲜

也要统一来相比，号召新、马两国左派为重归统一而“斗争”。和“不承认主义”相比，这个口号同样不具备政治现实感。但重新设定政治目标，以民族统一取代政权更迭，一定程度上显示了“社阵”领导人对 1966 年以来盲目追随中国“文革”的反思。和“社阵”以往推翻这个、打倒那个、空喊“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革命口号相比，这个方针要低调一些。但这个口号在“社阵”内部立即遭到非议，一些人起来造反，发表“马来亚人民的斗争目标不容歪曲”的文章，视李绍祖为“反动的当权派”，说这个口号回避了最重要的政权问题，不谈“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尽管新加坡左派从来没有拿起过枪杆子，一直都是在口头上谈武装斗争），取消了敌我之分，是修正主义。这种批判立刻被李绍祖在 9 月份举行的“全党性主讲会”（即宣讲其新路线的党员干部大会）上发表长篇演讲予以驳斥。李在讲话中每当提到那篇文章时，都用“那株毒草”称之。11 月“社阵”召开第三届党代会，李绍祖说“重新统一”方针已经引起“党内一场大论战，一场激烈和尖锐的思想斗争”。他搬出毛泽东“对于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的语录，放在《阵线报》头版头条，强调他的路线是反教条且符合毛泽东思想的，还警告说敌人“希望我们的代表大会破产。而反党分子、牛鬼蛇神更希望这次代表大会可以推翻党中央”，产生一个推行错误路线的新党中央。

但李绍祖显然缺乏毛的权威，一些坚持极左路线的“社阵”成员继续反对中央，具体行动之一是拒绝售卖党报（当时“社阵”有两份刊物，即《阵线报》和《党讯》，售价分别为 15 分和 10 分，不但是党的喉舌而且是经费来源之一）。不久“社阵”属下 6 个重要支部集体造反，向中央呈递“意见书”，指责中央要争取的是“敌人安排下的统一”，灌输“反动的国家意识”，“处处强调合法地位”（注：“社阵”和人民党等在新加坡一直都是合法政党，只要它们在口头上而不是行动上拿起武器推翻政府，李光耀的政府就不取缔它们），走上了修正主义和改良主义的道路。意见书说：“我们党虽然是一个合法组织的政党，我们党虽然没有武装力量，不能领导人民夺取政权，但这并不能也不应舍弃我们以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等伟大真理作为我们斗争的原则和奋斗目标。”这样，党内的当权派和“造反派”打起了毛泽东语录战，争相搬出“最高指示”以示自己是真正的毛派。值得注意的是，在回应党内这批“造反派”时，穷于应付的李绍祖第一次打出了反“左”的旗号，说“人民的要求是斗争的基础”，……‘意见书’提出了许多不实际的和荒唐的‘左’的论调。”对于新加坡多数人民满

足于独立后的现实和忙于民生、没有那种“斗争”意识和“革命”要求这个事实，李只能这样婉转表示，不然又会被党内“造反派”斥为贬低和诬蔑人民。

左派更严重的分裂是“社阵”和人民党的内斗。这两个党都标榜社会主义，亲华崇毛，看他们的出版物，就像看一场谁跟“文革”跟得更紧、谁背毛语录背得更多、谁骂李光耀骂得更恶毒的比赛。当 1965 年新加坡在李光耀的人民行动党主导下宣布独立时，两党结成统一战线，向民族政府挑战。李绍祖发表为新马重归统一而“斗争”的路线后，人民党以“捍卫毛泽东革命路线”自居，在《人民论坛》发表一系列文章，指责“社阵”没有得到其它左派政党和组织的同意擅自行动，一评再评、一批再批“社阵”“争取马来亚重归统一”的路线，就像中共 60 年代初发表“九评”挑战苏共领导地位一样。1969 年 9 月 15 日人民党以“部分党员”的名义发表“关于马来亚统一问题的意见提纲”，以毛泽东语录“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为大幅标题。10 月 15 日头版头条发表题为“什么是分裂主义”的文章，反驳“社阵”的批评，标题上方是大幅毛语录“我们现在思想战线上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开展对修正主义的批判”，以此点明“社阵”已经“变修”。11 月 1 日人民党中央委员会发表正式声明，表示完全不能接受“社阵”的新路线。这类文章连篇累牍，格式雷同，每篇都要拉上一段“毛主席语录”做虎皮，文风与中国“文革”文风完全一样，污辱与谩骂并行。

而面对人民党的挑战，“社阵”也不甘示弱，发表大量文章和李绍祖主席讲话，对人民党的问题一答再答，对人民党的指责一驳再驳。值得一提的是 1969 年 12 月 10 日“社阵”中央委员会发表“答人民党中委会的公开文章”，指出人民党是在恶化两党关系，分裂左派队伍。其中一段话实际道出了自 1966 年以来新加坡左派盲目追随中国“文革”所陷入的政治困境：“表面上看来人民党领导同志是很革命的样子，其实是空口说白话。你们到底要人民通过什么实际内容、什么斗争方式和方法去支持和声援人民战争呢？……这种空洞无物的乱发号召怎么会真的支持人民战争呢？怎么会促进革命运动呢？”由于人民党大量引用毛语录的战法使得“社阵”十分被动，“社阵”声明详细引用人民党文章中毛语录的出处和人民党的解释，反击说“‘歪曲毛泽东思想，对毛主席著作大胆曲解’，不是我们‘社阵’，而是这些反对统一，又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外衣来遮盖自己的右倾机会主者，……他们引用毛主席的讲话时，只引用开头的一段和后段一些，狡猾地漏掉中间的重要的讲话，狡猾地把讲话的头尾连接起

来，企图欺骗人们以为所引用的讲话是毛主席的完整的一段讲话。这是非常卑鄙下流的手法，不是真正左翼人士的作风”。

这场论战的“文革”特色还颇有意味地表现在“社阵”被捕人员的出狱问题上。1969 年 7 月李绍祖在“社阵”内部会议上表示，只要不对组织造成损害，一些被捕人士可以用出国交换出狱（新加坡政府对政治犯允许出国，只要发表悔过书），并说列宁、孙中山等革命领袖也在国外从事革命活动。李这一意见和其过去的立场相比有相当的缓和，也符合人性，很可能和他用重新统一取代夺取政权的新路线有关。这个消息透露后，《人民论坛》发表题为“‘妥协出国’和‘被迫出国’不能相提并论”的文章，批判李绍祖混淆两种性质不同的出国。《人民论坛》还在这篇文章的下方配发一幅漫画，画面上一个头颈上拴着铁链的囚徒匐伏在地，准备在一张“出狱条件”书上签名，在他的对面另一个人也匐伏在地，对他的出狱翘首以待，这个人留着大背头，身上写着一个“刘”字。很明显，这个“刘”指的是中国的“头号走资派”刘少奇，他在“文革”中的罪名之一就是曾经允许 61 个系狱的中共高干在向国民党签署悔过书之后出狱。这样，《人民论坛》就把李绍祖比作了刘少奇。由于人民党和“社阵”当时虽然在争论，但还没有彻底决裂，彼此还以“同志”相称，如同 60 年代初中共和苏共间关系。也因此，《人民论坛》的文章并没有直接说李就是刘，但把这幅漫画和批李的文章放在一起，其含义已经非常清楚。

今天回过头来看，“社阵”内部以及“社阵”和人民党之间的内斗，不但表现了毛主义和“文革”在新加坡左派中的恶劣影响，而且向人们昭示了一个没有成为现实的历史可能性：还未取得政权时，新加坡左派就已如此热衷于互相口诛笔伐，用文字置对手以死地，如果真的“革命”成功，手里有了“专政工具”，这种“党内路线斗争”又会导致多少人头落地呢？新加坡这个小岛难道不是要被淹没在血泊中吗？新加坡左派的分裂和内斗再次向人们揭示：以毛主义为意识形态的“革命”，例如红色高棉和秘鲁的“光辉道路”，以及其它许多所谓“斗争”中所发生的滥杀无辜决非偶然，而是在遗传中就继承了毛主义的基因。

六、追随毛“文革”的代价：新加坡左翼运动的瓦解



综上所述，20 世纪 60 年代末至 70 年代初，盲目追随中共“文革”，使得新加坡左翼运动完全丧失起码的政治现实感，其政治纲领和口号与当时新加坡的政治、经济及社会局面毫不相干。一个事例是：新加坡一独立，为了“居者有其屋”，李光耀政府就大力开发由政府资助、供居民购买的住宅。这个政府“组屋运动”是左派全力反对的政策之一，其效果适得其反，反而使政府对“居者有其屋”和社会稳定之间的关系有更清楚的了解。1967 年 10 月，新加坡举办第二届亚非国家建屋研讨会，以新加坡经验为样板。会议最后达成的一致意见是“人人皆自购屋，即不会变共党”，不但反映了新加坡政府组屋运动的政治效果，也反映出与会亚非国家对共产党和左派运动实在不胜其扰（见 1967 年 10 月 18 日《南洋商报》）。因此，当新加坡民族政府通过系统的经济和社会建设迅速建立起合法性，一个“新加坡人”的民族认同开始被接受时，左派运动便越来越边缘化。五花八门的政治口号和争论如同意识形态迷宫，连口号的提出者与争论的参与者都说不清楚这些概念到底有什么现实意义，彼此之间的区别又在哪里。唯一清楚的事实是，在争取民族独立和社会改造运动中发展起来的、本来很有希望的左派运动被毛主义“文革”引入了一条死路。

就在新加坡左派运动分崩离析的时候，毛泽东领导的中国给了它最后一击。1971 年 7 月美国总统尼克松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秘密访华，随后中美发表公报，中共宣布邀请尼克松访华。这个今天被称为中共“伟大外交成就”的交易，其实是因为毛挑动的“反修”斗争迫使苏联考虑对中国采取军事行动，面临此局势，毛又感到恐惧，不顾自己苦心经营而得来的世界“反帝领袖”身份，主动邀请帝国主义的“头号恶棍”进中南海。此举是向苏联表示：现在我有美国做后盾了。毛的国际政策从来就与其国内政策一样，一意孤行，出尔反尔，一切以自己的地位和影响为转移。打倒美帝是为了让他的“思想光芒”“普照全球”；在中南海和美帝头子握手言欢则是为了摆脱自己给自己制造的困境。至于这个突变会给遍布全世界的追随者带来怎样的打击，则完全不是他所关心的。今天的很多中国人，新老民族主义者，甚至包括新老左派，往往津津乐道于毛的“战略部署”，却忘记了，或从来就没有想到过，这个“战略部署”当年是给全世界毛主义的左派当头狠狠一记闷棍。邀请美国领导人访华本来无可非议，但正是毛主义和“文革”所全力推动的、以“打倒美帝国主义”为主要诉求的“世界革命”，却把这

次访问变成了一个令全球左派不可思议、难以相信、更无法接受的事件，尤其是它发生得如此突然，左派们毫无思想准备。在国际共运历史上，只有 1939 年 8 月斯大林出于对德国军事力量的恐惧，突然放弃推行了很多年的反法西斯路线和宣传，和德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德国于条约签订一周后就进攻波兰，挑起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件事可以相比。苏德条约的签订在当时给世界左派阵营带来沉重打击，导致大批人退出共产党或左翼组织。30 多年后，毛在中南海和基辛格、尼克松的握手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相同的后果。

在新加坡，毛泽东和“美帝头子”亲切握手的消息如同晴天霹雳，使得本来就分崩离析的左派运动雪上加霜，这个局面充分反映在社阵主席李绍祖 1971 年下半年所发表的几次“重要讲话”中，综合发表于 9 月 23 日的《阵线报》。李的报告的总题目是“党所面临的危机”。李承认“党今天瘫痪的事实是不能掩盖的思想分歧，组织的松散，财政的困难，我们人手的缺乏，士气低沉，我们党在群众中已相当程度上被孤立，而这些困难，这些对我党不利的情况正日益恶化，越来越难以克服和解决。”文中还提到，新加坡左派的危机是在 1968 年左右就产生了。在分析党面临的危机时，李绍祖公开承认“造成今天我党瘫痪的另一主要因素是”极端‘左倾’的思想、口号和言论“。一些”口头革命派……乱说理论，大谈革命，……这些极端‘左’倾人士只能制造党内混乱，给同志失去信心。“更为讽刺的是，一些以往大谈‘乡村包围城市’，滥引毛主席语录的人士，他们今天做的，不是革命工作，而是照顾自己个人的生意和事业！”

那么，这些极端左倾的思想是哪里来的呢？李绍祖终于明确承认“中国文化大革命大大影响我们党同志的思想。文化大革命，有各种各样的思想传播出来，造成我党很多同志犯上极端‘左’倾的错误，一些言论，在中国具体情况下，可能是很正确。但搬到星岛和社阵里，就完全不同了……一些同志一个时期大谈什么‘推倒当权派’，‘推倒中央’！这只是一个简单的例子。我相信大家脑海里都会清楚：中国文化大革命的一些言论对我党的影响是不好的。”

对于中共和美帝握手言和给新加坡左派带来的严重冲击，李表示：“一些同志因为不同意中国目前的外交政策，很快的感到心灰意冷。他们失去信心，连一点情绪都没有。他们甚至以为中国与尼克松搞好关系的话，那么，马来亚的民族解放斗争也将完蛋。”

在公开场合，相信李绍祖在当时情况下关于中国和“文革”所能说的就是这些了。他到 70 年代初才认识到，跟着“文革”走上了死路，只是这时为时已晚。而毛泽东为了一己私利，会毫不顾及千万崇拜者和追随者。曾经轰轰烈烈的新加坡左翼运动已经被毛主义葬送。此后，“社阵”连一个公开解散的日期和场合都没有，就无声无息地消失了。

这当然是李光耀最希望看到的结果。中共改变外交路线，逐步放弃“世界革命”，不但与“美帝”和好，而且“各国反动派”一眨眼也成了中共的“国际友好”，使得中共可以在国内大言“我们的朋友遍天下”。李光耀不再是“帝国主义的傀儡”和“反华小丑”，在毛泽东去世前一年即 1975 年第一次成为中南海的座上宾。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李光耀在新加坡代表团中以国会特邀代表的名义安排一个名额给李绍祖，而李绍祖也欣然接受，跟着曾经被自己用最恶毒语言诅咒的李光耀前往已经不再是“世界革命”中心的北京。无论李光耀的安排出于何种心理，对于一个国家和民族来说，这应该算是为一个动荡纷争的时代划上了一个句号。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新加坡的左派运动是在马来亚共产党领导的直接影响下展开的，新加坡左派不但在思想上而且在组织上都把自己看作是整个马来亚革命的一部分。那么，对马来亚革命又该如何评价呢？马共领导人之一余柱业晚年的反思或可为读者提供一个参考。余曾经担任马共南方局书记，在印度尼西亚遥控新加坡的“革命斗争”，后来前往中国，建立“马来亚革命之声”电台，新加坡左派传播的很多有关“文革”和世界革命的消息和号召就是从他那里来的。他晚年回顾自己一生的斗争，认为马共反殖民主义的功劳不能抹杀，但是后来幸亏马共没有成功。为什么呢？他说根据他“对马共干部的认识，对共产党组织的认识、对阴暗面、不好一面的认识”，“从历史的观点来说，马共没有胜利，还算是马来亚的幸运。万一马共成功的把他们所要建立的人民民主共和国建立起来，我们会看到象现在柬埔寨的那种局面。”——连马共的领导人都承认，马共的失败，使马来亚（包括新加坡）避免了一场象“红色高棉”那样的浩劫。[11]毛泽东戳力推行的“世界革命”到底于人类进步有何意义，已经无需多说了。

作者说明：本文为作者 2007 年 5 至 8 月在新加坡国立大学亚洲研究所作访问研究的部分成果。在此向该所致谢，同时向很多对本研究提供帮助和意见的同行致谢，尤其是陈剑、黄坚立和杨斌诸位先生。



注释：

[1]马来亚共产党和新加坡左翼运动之间的密切关系反映在很多历史文献中，最近的可参考《浪尖逐梦——余柱业口述历史档案》，为陈剑主编《风云丛书》第一辑，马来西亚策略资讯研究中心，2006 年；方状壁的《马共全权代表方壮壁回忆录》，马来西亚策略资讯中心，2006 年。

[2]李光耀，《李光耀回忆录，1965－2000》，新加坡《联合早报》出版，2000 年，128－129 页。

[3]陈剑，“意识形态与新马四十年社会变迁”（初稿，未刊），4 页。

[4]林清祥，“第一届社阵代表大会工作报告”，载《林清祥与他的时代》，“马来西亚历史的另一面”编辑委员会编，社会分析学会与朝花企业联合出版，吉隆坡，2002 年，下册，149 页。

[5]红桦，《赤道上的人们》，新加坡万里文化企业公司，1971 年，34－35 页。

[6]林清祥，“右派眼里的国会民主是什么？”，同注[4]，163 页。

[7]载《当代中国研究》2006 年第 3 期。

[8]见“马共秘密电台湖南曝光”，《亚洲研究》2000 年 7 月 2 日。

[9]朱成发，《红潮——新华左翼文学的“文革”潮》（注：“新华”意为“新加坡华文”），玲子传媒私人有限公司，新加坡，2004 年，21 页。本节中另有一些材料来自此书，为节约篇幅不再引出处，特此说明，并向原书作者致谢。

[10]李光耀，《李光耀回忆录，1965－2000》，492 页。

[11]余柱业，《浪尖逐梦——余柱业口述历史档案》，262 页。

（程映虹，历史学者,任教于美国德拉华州立大学。原载《当代中国研究》2008 年第 1 期。文章链接：https://cochina.org/?p=8152）

【返回目录】





7-4 萧延中：细说台湾的“ 毛泽东热”

“一个被反复言说、乐此不疲的话题之本来功能就在于：历史以自己超越个体生命的形式不断地讲述着关于祖先的经历、磨难、斑迹和教训。“历史”之伟岸超越和难以捉摸的魅力或许就在于此。”



从上世纪 80 年代初开始，台湾的中国大陆研究和“毛泽东研究”开始从妖魔化向学术化转变，而 2004 年台岛掀起的“毛泽东语录热”，我们既可以从中看出“左派”的价值冲动，又有“右派”的防身之术。

从“妖魔”到“人物”

从上世纪 80 年代初开始，台湾的中国大陆研究和“毛泽东研究”开始向学术化转变，以《匪情研究》改刊名为《中国大陆研究》为其标志。最明显的现象是台湾各研究性著名大学的博士、硕士论文的相关主题不断增加，笔者看到的博士论文就有《斯大林主义与毛泽东思想之比较研究》《毛泽东与文化大革命—— 关于“文革”起因之研究》等等。

说起台湾的“毛泽东研究”，不能不提起王振辉这个名字。王振辉从台湾政治大学东亚研究所获博士学位以后，就选择了“毛泽东研究”为主攻方向。数十年前的台湾，如果不是在尖端的研究部门，选这个方向可以说不仅是“冷僻”，而且甚至是“孤立”。（台湾爱国人士在总统府前挥舞着五星红旗）



令人感慨的是，王振辉身处一个教会学校——台中的静宜大学，关于毛泽东的资料并不像中国大陆那样唾手可得，居然能就毛泽东早年的经历和思想，写出详细的几卷著作，然后自己筹款印刷发行。打开《中国的民族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兴起》等近百万字计的研究成果，其细腻的史料梳理，严谨立论分析和旁征博引的中外著述，竟使人甚至怀疑这不可能出自台湾学者之手。

这个时候，社会上比较学术化的研究作品也陆续出版，更多的是台湾学术界对毛泽东的评价直言不讳。但应看到，此时的“批判”与 20 年前的“丑化”绝不能混为一谈。

其中，台湾大学历史系童长义博士翻译的日本产经新闻社编辑的有关毛泽东的书籍，就明显地反映出这一特征。这些来自日文的相关报道和时事评论，是从 1998 年 3 月开始以《毛泽东秘闻》为题的连载文章，从该书的第一部“四人帮垮台”、第二部“炮打司令部”一直讲到第六部“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尽管属通俗性的历史读物，但书后附有详细的年表、参考文献和人名索引。据说，类似这样的书非常抢手，也不知道是第几次印刷了。

但真正让人吃惊的，是台湾著名中国思想史家韦政通先生的毛泽东研究著作。

韦政通先生早年得到劳思光教授的启蒙，又受到牟宗三先生影响，立志向学。1958 年由徐复观先生大力举荐，以著作检定方式获教师资格，著有《中国思想史》、《中国十九世纪思想史》等书凡 31 种。可以说，韦政通是并非科班出身却实现了超过科班的成果，证明了自己的能力的人。是不是他的这种特殊经历与毛泽东的教育理念存在着暗合之处呢?仔细想来，这倒好像未必没有一点道理。

韦政通教授的两部毛泽东研究的著作，是 1999 年 9 月版的《无限风光在险峰——毛泽东的性格与命运》和 2001 年 8 月版的《一阵风雷惊世界——毛泽东与文化大革命》。

据韦教授自述，这前一本书是受到弗罗姆《人类破坏性的剖析》一书的影响，试图从人格心理学的角度阐释毛泽东，最后作者给出一个相对中性、但又明显感叹的学术断语：“‘大人物’的所作所为，从一般的价值观点，是无法理解的，他们具有强大的破坏力，但也是历史的

主要推动者。毛泽东的时代，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在 20 世纪的中国，毛泽东是最具影响力的人物，在未来，其影响力势必仍将持续。”

而后一本书可以看作前一本书的空间展开，也可以看成是史实验证。无论怎么说，后者比前者都要宽阔得多。

2004 年，台湾开始出现“毛泽东语录热”

其实早在 1974 年“文革”期间，台湾就暗地里流传着大陆版的《毛主席语录》，只是只能在极小范围“内部阅览”。与此相对应的是，公开出版物则有王国琛所著《毛泽东语录的透视》一书，该书简约，共计 22 章，采取边引证边“批判”的形式。

但 20 年以后，《毛泽东语录》居然在台湾各大书店公开“隆重”登场，媒体为此喧闹了好一阵子。笔者也亲眼见到，在台大对面著名的“诚品书店”里，火红的《毛泽东语录》就摆在进门大厅最显眼的位置上。

笔者有幸与此书的策划者和发行人长谈了一个下午。那是一个挺帅气的小伙子，大名杨一峰。

杨一峰很健谈。虽然对于《毛泽东语录》的策划，他三缄其口，但也看得出其中不乏成功的得意。话题转向了对毛泽东的看法。说来话就长了：杨一峰的父亲属于台湾公款留学美国的知识分子，是个信仰坚定的国民党员。后来杨一峰也到了美国。他父亲毕业后坚决要回台湾，以“报效党国”，但作为中学生的杨一峰则不想回去。经过妥协，家里又送他到日本读完大学。这样的经历使杨一峰比一般的孩子更“各色”：“政府”越不让听什么，他就专门“偷听敌台广播”。由于掌握英、日两种语言，可知的世界大得多。“这样，我成了一个典型的‘叛

逆者’”，他是这样评价自己的，“那时官方总说毛泽东如何如何地坏，而我却在想：既然那么坏，怎么能打败老蒋而占领大陆呢?”

于是有一阵子，杨一峰专读台湾禁书，什么((共产党宣言)、《毛泽东选集》，都是英文版，逐渐变成了一个“左派”的崇拜者。

杨一峰现在是一个小型出版社的小老板，自己当自己的家，在其办公室最明显的地方，摆放着古巴革命者切．格瓦拉的照片。杨一峰向我透露，他的出版社之所以叫做“东观国际文化股份有限公司”，其意思是以东方的视角观察国际事务的文化机构，公司标志则是一只圆睁着的大眼睛，杨一峰特意告诉我，：那可是一只 ‘左眼’哦!”

这本《毛泽东语录》，大陆版中原“再版前言”被删除，代之以台湾《新新闻》周刊副社长杨照所撰台湾版《毛泽东语录》的“导读”。扉页上印着庄重的小字：“献给对这个世界还有梦想的人”。

台版《毛泽东语录》除了照录了原版的全部内容，还增加了《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和《反对自由主义》五篇毛泽东的著作，最后附上了“毛泽东诗词”和“毛泽东 1967～1969 指示”两部分内容。看得出来，这样的编排是花了心思的。

杨照的书序正题是：“策略与教条的辩证——重读《毛语录》”，分为三部分。“导读”开篇就说：“毛泽东是个现实的策略家，他是这个共产党最大的贡献，而且他之所以能成为中共的领导人，正在于他从来没有真心相信过马克思主义教条，也没有真正服从过共产国际的路线指示”。

杨照认为“毛路线”由三大主题所构成：其一，“承认相当长时间中，总的形势是敌强我弱，所以总战略，必当是持久战，可是战术上又必须追求有限的速决战”；其二，“承认中国社会的复杂性，不相信阶级论、经济决定论真的就可以‘化繁为简’。二十世纪的中国，对毛



泽东而言，是古代、近代、现代同时并存的，不可能单靠一套‘现代’标准，来判定中国社会成分与社会情势”；其三，“要靠懂得如何运用中国农民听得懂、听得进去的语言”。

话挑明了，杨照的意思是说，毛泽东就是靠着这三条，打败了老蒋，影响了世界。今天要与大陆打交道，要认识、探触到毛泽东性格下的中国现实：“我们别无选择，还是回过头读读《毛语录》，理解《毛语录》的内容，及其语言与权力的策略”。

可见，台湾版《毛语录》其实也是一种“策略宣言”，其中有“左派”的价值冲动，也有“右派”的防身之术。据说台湾版《毛语录》卖得不错，问杨一峰究竟卖了多少，他说这是“商业秘密”。但我看去年年底已是第五次印刷，私下估计不会少于5000～6000册。要知道，这在台湾出版界可不是一个小数字。

随着时间推移不断被重新评价的“人物”

或许由于身份和影响的考虑，与台湾业内精英谈论毛泽东总感觉有一点“约束”。仔细揣摩，其实这种情况的存在，与其说是由于“禁忌”，不如说是出于“谨慎”，而之所以需要谨慎，我想大概是因为面对的问题过于复杂。

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陈永发院士，是专攻中共党史的台湾顶级学者。他在美国斯坦福大学就读时师从Lymanvan Slyke教授，博士论文《Making Revolute On：the Communist Movement in Eastern China. 1936-1945》（《制造革命：1936一1945年华东共产主义运动》），曾获得1986年加州大学出版社有关东亚研究的最佳著作奖；后来又与英国学者Gregor Benton合著《Moral Economy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道德经济与中国革命》）等书；近年他煌煌数百万字的《中国共产革命七十年》(上下册)，更以翔实的史料和中肯的评述，受到海内外学术同行的认可。



陈院士以稳健和谦虚著称，在我们闲谈时涉及到毛泽东的定位，他的一句话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无论如何不能否认他的确是个‘人物’！”我想这里的“人物”二字分量很重。

在严谨的历史学家眼中的“人物”显然与常人不尽相同，那将意味着这样的角色尽管难免随着现实需要而被不断地“重新解释”。但一个板上钉钉的事实则是，他已经属于那些要被后人“留下”的那一类，在历史的系谱中被安排一个合适的位置。

作为历史学家，陈永发院士的研究视角是复原具体的政治过程，试图在政治事件的细节中展示宏观的历史主题。当我问他“为什么选择研究中共党史”时，他简约地说是觉得许多既成历史的基础成因其实并没有说清楚，这其中不能排除由于意识形态倾向的装饰、掩盖和曲解。比如，为什么毛泽东竟然可能在短短 20 几年时间内聚集了如此强大的力量，最后实现了自己的目标?无论就国民党内部的知识教养，还是就共产党高层的文化素质而言，毛泽东只是其中众多的优秀者之一。但他究竟用什么办法，在结果的角度上拔地而起，非常耀眼地凸显出来?在这其中必有奥妙。所以他把目光聚集到了延安时期，探讨毛泽东在极其困苦的环境中究竟是如何运作的，这就形成了他那本关于延安政治运作的著名作品。毋庸赘言，在此一时期，中国大陆的同专题研究还没有涉及到这样微观的层次。

一次在向台湾中研院近代史所许倬云院士请教中国先秦思想特质问题的时候，偶尔把话题转向了毛泽东。这位著名的资深历史学家平静地说，“就像拿破仑一样，每过 10 年人们对毛泽东的评价就要‘翻个个’。”

我理解的许院士的深意是一个被反复言说、乐此不疲的话题之本来功能就在于：历史以自己超越个体生命的形式不断地讲述着关于祖先的经历、磨难、斑迹和教训。“历史”之伟岸超越和难以捉摸的魅力或许就在于此。

大家之席论，四两拨千钧。尽管许院士是专攻中国古代史的，对商周史更是大家，但看来在他们眼中“毛泽东”三个字，无论是个人，还是指精神，都在历史中留下了深深的痕迹。



（萧延中：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教授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政治学理论、中国政治思想史、毛泽东政治思想研究。原文链接：http://news.qq.com/a/20100729/001738.htm）

【返回目录】



【兴】

7-5 潘卡•米什拉：毛主义对全球穷人前所未有的影响力



“作为国家意识形态，在中国，毛主义可能会减少到近乎毫无意义，但是可以肯定，在世界上许多角落，毛主义会长久地存在下去。”

2008 年，我在北京见到了小说家余华，他那时候刚从尼泊尔回来。在那里，毛泽东的思想激励革命者们推翻了君主制。作为文革时代的红卫兵，和很多他的同龄人一样，他对毛有着极端复杂的看法，而令他惊讶的是，当他听到尼泊尔毛主义者们高唱他年轻时所熟悉的歌曲时，他从未想过他此生会再次听到（那些歌曲）。

实际上，尼泊尔毛主义者的胜利，只是毛泽东“归来”的标志之一。在印度中部，一些武装团体自豪地称呼他们自己为“毛主义者”，他们控制了一个广大的区域。这片区域资源丰富，印度政府试图保持这里的安全，但却遭到毛主义的激烈抵制。根据《外交政策》杂志最近的一个报告，像丰田和可口可乐这样的跨国巨头都非常依赖这里的矿产资源开发。

似乎是不肯落后于国外的毛主义者，一些中国人已经开始精心调动人们对毛泽东依旧含混的记忆。通过短信发送毛语录； 在国有的电视台和电台上广播“红歌”；薄熙来，这位雄心勃勃的中国西南部重庆市的党委书记，正在领导一场意想不到的毛主义复兴运动。



在 08 年金融危机之后，学术界和新闻界更多地是宣称马克思的回归，而不是毛的回归。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明确预期了资本过多积累的问题，并观察到了浮躁而投机的投资者造成了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发展参差不齐：在造就富人的同时，造就了更多的穷人。但毛泽东的“中国化的”和可实践的马克思主义，其中包括游击战争的蓝图，对于许多贫穷国家的人来说更加直接有效。

人们乐于简单地妖魔化毛泽东，或者谴责今天的毛派同秘鲁的“光辉道路”游击队和红色高棉一样罪恶。虽然，毛泽东对中国造成的暴力损害的规模相当于过去的两个世纪建立国家的过程期间所有其他灾难的总和，但政治和经济现代化的过程，在世界的其他地方也付出了可怕的成本。仅在上个世纪中，在亚洲的广大地区，从土耳其和伊朗到印度尼西亚和台湾，数以百万计的人们死于政治冲突、饥饿和残酷的剥削。

所有的民族国家都会去洗白它们国父的劣迹。然而，领导那些前殖民地国家独立的国父们的影响力已经式微——几乎没有人会被苏加诺的书籍激励，或者像纳赛尔及真纳那样，被凯末尔的民族主义所激励。所以，对毛的谴责并不能解释其在国内外深远而持久的影响力。

中国新一代领导人最近求助于毛，一点都不奇怪，正如他们同时也将孔子作为意识形态合法性的来源加以征引。向毛求助，是权宜民粹主义（expedient populism）的范例，不安的统治阶级屡试不爽。作为新中国的象征，毛泽东和姚明、李娜一样，只是不具刺激性的符号。然而，对于很多外国人来说，有一个危险得多的毛。对于他们来说，毛并不是饱受争议和批评的大跃进运动和文化大革命的发动者，正如余华在即将完成的一本书中所写：“毛泽东在中国所做的事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他的思想保持着活力，如同在肥沃土壤中的种子一样，生根，开花，结果。”

在毛灾难性的统治之前，他就已经发展出了这些易于传播的思想。事实上，他为革命前的中国遭受的疾患开出了药方：“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1927）、“论游击战（On Guerrilla Warfare”（1937）、疑为“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1938）和“论持久战”（1938），这些理论，使他在面对竞争对手时赢得了决定性的优势。

在他的职业生涯早期，他将中国内地的封建精英和半殖民地沿海城市中的资本家视为敌人，然后成功地动员“人民”军队击败了他们。毛泽东的理论和实践在许多农业国家，总是比古典的、城市化的马克思主义有更大的吸引力。在那里，得到外国援助的渺小精英，统治着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

近半个世纪前，越南和古巴的民族主义团体成功地实现了毛泽东的农村包围城市战略。在经济全球化的现在，包围着城市的农村为毛泽东的理论和实践提供了新鲜的土壤。 对于这些扩张的全球化资本主义的受害者，毛主义不再无关紧要，而是重新成为富有吸引力的理论。

一个典型的例子发生在印度中部的森林。在这里，印度政府冷酷无情地把该地区巨大的矿产资源向私营和跨国公司开放的行为，诱发了毛派的叛乱，在那些认为每个人都会热爱自由民主和 iPad 的小资眼里，用毛泽东的豪言壮语唱衰当地“买办”和帝国主义者的印度毛派看起来可怜得要死。但是，那里的毛派，虽然有些腐败和野蛮，但是已经在数百万土著人民（Adivasis 人）中间站稳了脚跟。这些土著居民脆弱的自给自足经济已经被跨国巨头和它们在印度的代理人破坏。

印度作家沙什安克•科拉指出了毛派在 Adivasis 兴盛的重要原因：“这些毛派分子的生活状况，而不是毛主义的思想，把毛派的追随者推入与被剥夺进行绝望斗争的状态。”科拉写道，“采矿和重工业使得 Adivasis 人流离失所，摧毁了他们的生计，却没有给他们带来工作机会。他们只能加入庞大的民工海洋，陷入贫困，接受那些过度劳累却只能获得最低薪水的职位。”

人们不知道毛派叛乱将会何时结束。在过去的 10 年里，印度准军事部队试图镇压毛派叛乱，并造成超过 10000 人丧生。尼泊尔的毛派在推翻君主制后，参与了选举。印度毛派短时间内不会放弃武装抵抗。

印度政府或许会发现永远不可能在军事上压倒他们。对于这些受害者来说，经济全球化的好处流向他们的可能性比流向那些美国中西部后工业城市更难以想象。科拉写道，“工业资本主义没有丝毫可能向人民提供剩余价值，Adivasis 毛主义者将永远成为工厂中的无产阶级”。

一个漫长和血腥的僵局正在招手。作为国家意识形态，在中国，毛主义可能会减少到近乎毫无意义，但是可以肯定，在世界上许多角落，毛主义会长久地存在下去。”

（powerzhang 编译）

（潘卡•米什拉 Pankaj Mishra，英国《卫报》撰稿人。文章链接：https://cochina.org/?p=8155）

【返回目录】



【论】

7-6 贾金玲：国外毛泽东思想研究的历史进程及主要理论成果



“正是随着毛泽东思想的成熟和研究的多方面展开，毛泽东的国际威望提高，毛泽东思想在世界范围内得以广泛传播，才促成了国外毛泽东思想研究的热潮。”

国外毛泽东研究，最早始自20世纪20年代共产国际对毛泽东及其文章的译介，30年代美国著名记者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引发了美国研究毛泽东及其思想的极大兴趣，而后研究扩展到西欧和加拿大，80年代后扩展至澳大利亚。根据研究的深入程度、研究的规模，大体以三大事件（1949年新中国成立、20世纪50年代末中苏关系恶化、20世纪80年代初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历史决议》）为标志分为四个研究阶段，各自形成了丰富的理论成果。

一、20世纪20年代至新中国成立前：研究前奏或理论准备阶段

国外最早介绍毛泽东及其思想的应是总部设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共产国际出于国际意识形态斗争的需要，在向国际共产主义阵营宣传和介绍中国革命的过程中，也对毛泽东及其思想进行了大量的宣传和介绍。1927年5月号的俄文版《共产国际》杂志刊登了毛泽东的《湖南农



民运动考察报告》，随后又在该杂志6月12日的英文版将该文刊发了出来[1]并评论说：“在迄今为止介绍中国农村状况的英文出版物中，这篇报告是最为清晰的。”[2]1936年第18期刊登了由毛泽东执笔的《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1937年第9期刊登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1939年第4期刊登了《论新阶段》等。1934年8月前后，共产国际翻译出版了第一本毛泽东文集，取名《经济建设与查田运动》：“公开出版毛泽东文集，这在毛泽东思想发展史上还是第一次。”[3]这些宣传报道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域内扩大了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影响，成为国外毛泽东思想研究的前奏。

在西方，以美国的埃德加·斯诺和艾格尼丝·史沫特莱为代表的进步记者和作家，在20世纪20、30年代先后来到中国，向世界报道中国红军和中国共产党的斗争和业绩，开了西方对毛泽东及其思想研究的先河。1929年史沫特莱以《法兰克福日报》记者身份来到中国，在江西苏区的初创时期，她冲破了国民党对新闻的封锁，撰写了《中国红军在前进》一书，这是西方记者向世界介绍井冈山时期红军战斗情况最早的作品。

1936年斯诺来到陕甘宁边区并生活三个多月，他把在根据地的所见所闻所记写成通讯、报道等，刊发在当时美国纽约的《美亚》、美国人在上海创办的《密勒氏评论报》等杂志上，在西方引起轰动。1937年10月斯诺将他在陕北的访问记等汇编成《红星照耀中国》出版，之后被译成20余种文字，向外界真实地介绍中国革命及其领袖毛泽东，彻底批驳了中国共产党人是土匪的谣言，成为世界了解、认识毛泽东及其思想最具影响的窗口。1939年斯诺再次访问延安之后，于1940年1月在《密勒氏评论报》上刊登了《1939年同毛泽东的谈话》，介绍毛泽东关于“统一战线和政策问题”、“国际问题”等思想。

《红星照耀中国》的确使毛泽东在1937年成了举世皆知的人物。[4]它吸引西方许多新闻记者前来中国采访报道，写下了《续西行漫记》（尼姆·韦尔斯）、《中国未完成的革命》（爱波斯坦）、《红色中国的挑战》（根瑟·斯坦因）、《来自红色中国的报告》（福尔曼）、《早晨的洪流》（韩素音）等著作。

1944年6月中外记者参观团到陕甘宁边区参观访问，毛泽东同他们进行了会谈。随后，美国记者爱波斯坦写成《这就是毛泽东——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发表在1945年9月2日的《纽约下

午报》，时值毛泽东赴重庆参加国共谈判，此文在西方引起很大影响。另外根瑟·斯坦因写成《毛泽东会见记》两篇、斯特朗写成《毛泽东访问记》，三人的文章都编入《毛泽东印象记》[5]在西方发表，扩大了毛泽东在美国和世界的影响。

1946年8月，毛泽东会见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提出了“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通过斯特朗的报道，毛泽东的这一论断很快传到西方。1947年斯特朗根据她和刘少奇等中共领导人的谈话写成《毛泽东的思想》，[6]发表在纽约的《美亚》杂志上，由此诞生了世界上第一篇论述毛泽东思想的文章。[7]

1948年，美国“中国学”专家费正清出版《美国与中国》一书，用一定篇幅论述了“毛泽东的兴起”，他注意到“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似乎是很特殊的”，初步涉及了毛泽东思想研究。这些报道和著作，扩大了毛泽东及中国共产党、中国红军在国统区以至国外的影响，同时为西方50年代后逐渐兴起的毛泽东研究提供了许多真实可信的原始资料，作了必要的理论准备。

二、新中国成立后至20世纪50年代末：研究展开阶段

新中国建立后，毛泽东成功访问苏联，中苏关系进入蜜月期。以斯大林为首的苏共高度赞扬中国革命的胜利并充分肯定毛泽东思想的国际作用。20世纪50年代初苏共就开始翻译出版《毛泽东选集》，介绍和宣传毛泽东思想；1950年12月苏联《布尔什维克》杂志先于中国的《人民日报》译载了毛泽东的《实践论》，并于12月18日在《真理报》上发表了编辑部文章《论毛泽东的著作〈实践论〉》，对《实践论》进行全面介绍和评价；毛泽东的《矛盾论》在国内公开发表后，得到苏联理论界普遍的肯定性评论；1957年毛泽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发表后，当时的苏联学者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思想给予了高度的评价。1952年苏联开始陆续翻译出版俄文版《毛泽东选集》第1-4卷。

美国在1950-1954年间掀起反共逆流，推行麦卡锡主义，同时驻新中国的外交官或受到清洗、或遭解雇或被指控为间谍；文化界人士费正清、史沫特莱、斯诺等因同情中国共产党或客观评价中国问题而受到麦卡锡的迫害，美国的中国问题研究及毛泽东研究一度陷入低迷状态。1958年以后，官方逐渐转为鼓励开展海外问题研究，并且为研究机构提供专项基金，美国的当代中国问题研究才出现了迅速发展的势头。

此时期欧美毛泽东研究较有影响的著作有：弗罗芒坦于1949年出版的《毛泽东：红色的龙》、罗伯特·佩恩1950年出版的《毛泽东：红色中国的统治者》、史华慈1951年出版的《中国共产主义与毛泽东的崛起》、费正清、K.布兰特、史华兹1952年出版的《中国共产主义历史文献》。史华兹的《中国的共产主义与毛的崛起》提出了“Maoism”（毛主义）这一专有名词，《中国共产主义历史文献》一书利用中共历史文献来阐明“毛主义”的形成过程和理论特点，这两本书被公认为西方开始研究毛泽东思想的标志性著作。

毛泽东著作的传播情况：1949年10月法国的彼埃·西盖尔出版公司出版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法译本，1950年美英差不多同时出版了《讲话》英译本。中国出版和学习《毛泽东选集》的热潮影响了欧美国家，1954年英国翻译出版英文版《毛泽东选集》第1卷；1959年冰岛出版了《毛泽东选集》第1卷；20世纪60年代初美国出版了两种英文版本的《毛泽东选集》；1951年12月，美国的鲍德·考普顿编译了《毛的中国：1942年至1944年整风文件汇编》，收入毛泽东著作6篇，由华盛顿大学出版社出版。

三、20世纪60、70年代：热潮形成阶段

前苏联东欧国家对毛泽东思想的研究深受中苏两国、两党关系的影响。由于当年中苏两党意识形态分歧尖锐化，中苏关系破裂，前苏联东欧国家由20世纪50年代肯定和颂扬毛泽东转为批判“毛主义”。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及其著作主要有：1968年V.G.格尔布拉斯的《毛的假社会主义》、1970年康斯坦丁诺夫和斯拉德科夫斯基等人编写的《对毛泽东思想理论的批判》、

1971年科尔巴什写的《毛泽东主义的经济理论》、1972年鲁缅采夫写的《毛泽东思想的起源和发展》、1974年苏联、保、匈、波、东德、蒙古等国学者合写的《毛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政治上的敌人》、1975年G.吉尔金诺夫的《毛主义的思想体系和政策》、1977年斯拉德科夫斯基等人的论文集《毛主义思想政治本质》以及1979年由苏联、东欧和古巴等共同参与出版的论文集《没有毛的毛主义》等等。他们全面地歪曲和攻击毛泽东思想，内容充斥着强烈的政治偏见和反华宣传。

攻击和丑化毛泽东的传记性著作有：1962年匈牙利的乔治·帕洛克兹·哈尔瓦思写的《毛泽东：蓝蚁国王》、1971年匈牙利的乔治·厄本的《毛主席的奇迹》、1976年弗拉基米洛夫的《毛泽东的政治传记》等，由于缺乏客观性而没有多少学术价值。

原南斯拉夫学者德鲁罗维奇在《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一书中肯定中国武装革命胜利的经验，肯定中国革命道路的思想。他在书的序言中指出，与马克思预见的不同，中国革命是以农民为主体的，毛泽东的功绩在于从中国实际出发揭示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殊矛盾，毛泽东的著作反映了中国革命实践的策略思想。南斯拉夫哲学家普雷德腊格·弗兰尼茨基所著《马克思主义史》从1961年到1978年先后出版五版，“中国和马克思主义”一章系统地介绍和评价了毛泽东思想。

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取得的伟大成就挫败了美国对华“遏制”和“封锁”的反华政策，同时中苏意识形态领域的论战以及“文化大革命”运动，都引起西方学术界的极大关注。欧美有识之士认识到研究中国问题的重要性，提出要把“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变为新时代的东西，为与中国和平相处而斗争等。20世纪70年代中美邦交逐步正常化，欧美学术界更是把中国问题研究作为全国性事业，进一步促进了毛泽东及其思想等的研究，毛泽东思想的研究开始获得长足的发展，形成了国外毛泽东研究的一个高潮时期。美国很多大学设有中国研究机构，学术界荟萃了诸如费正清、卡尔·魏特夫、斯图尔特·施拉姆、罗斯·特里尔、史华慈、陈志让、A·科恩、F·韦克曼等一大批学者，他们借助于1960年创刊的《中国季刊》杂志为阵地，就“毛主义”的本质有没有独创性的问题，在20世纪60-70年代展开了两次大的论战，形成了可喜的理论成果。

第一次论战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由“右派”学者卡尔·魏特夫首先挑起，他针对史华慈1951年在《中国的共产主义与毛泽东的崛起》中提出的“毛主义”概念，认为毛泽东的思想是有别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异端，或者说具有“独创性”的观点；在《“毛主义”的传说》中，提出了毛泽东的革命战略都是从马克思、列宁和斯大林那里搬来的，中国革命是莫斯科阴谋的产物，没有什么独创性，从而形成了“莫斯科中心论”或“阴谋论”的观点；史华慈发表了《“毛主义”传说的传说》进行反击，指出他使用“毛主义”这一概念，强调了毛泽东的独创性，中国革命的胜利是毛泽东与独创性的革命战略的胜利。此后双方为驳倒对方又进行了几个回合的论战，形成了以下理论成果：《“毛主义”的“传说”或“传说的传说”——魏特夫复本杰明·史华慈教授的评述》、《“毛主义”的实质》（亨里克·夏德马的评论）、《魏特夫教授的评述》。

1976年在《近代中国》杂志上，欧美学者中爆发了“左翼”和“自由派”之间关于毛泽东思想的第二次论战。“左翼”的主要代表是理查德·佩弗和安德鲁·沃尔德等，“自由派”的主要代表是费正清、布兰特、史华慈以及施拉姆等。论战主题是：毛泽东思想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关系问题。“左翼”不同意“自由派”的“异端论”，佩弗等人认为，毛泽东思想的独创性不是对马列主义的背离，而是在中国实现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目标的一种革命发展战略。“自由派”学者施瓦茨、施拉姆、迈斯纳等更强调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异端性（区别），比如认为马克思更带有“经济决定论”的倾向，而毛泽东则更接近“唯意志论”[8]。

通过论辩产生了以下主要理论成果：佩弗：《马列主义传统中的毛泽东和马克思》、安德鲁·沃尔德：《马克思主义、毛主义和社会变革》、史华慈：《再论马克思主义的本质：一个答复》、施拉姆：《对佩弗—沃尔德在中国研究中的“革命”的一些看法》、金思恺：《毛泽东思想的内容与形式》等。

这一时期欧美学者关于毛泽东思想的其他著作和论文主要有：施拉姆：《毛泽东的政治思想》（1962年）与《毛泽东》（1966年）、麦克法夸尔：《毛统治下的中国》（1966年）、陈志让：《毛泽东》（1969年）、迪克·威尔逊：《毛泽东思想在历史上的地位》（1977年）、

J.B.斯塔尔：《继续革命：毛泽东的政治思想》（1979年）、莫里斯·迈斯纳：《毛泽东的中国》（1979年）。其中施拉姆的《毛泽东》在出版后10年间再版8次。

60年代到70年代，欧美各国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的理论成果日趋增多，具有一定学术价值的成果包括美国的阿瑟·科恩1964年出版的《毛泽东的唯物辩证法》、格拉伯曼1968年出版的《毛泽东——辩证法大师》、法国米歇尔·卢瓦1971年发表的《〈实践论〉法文版前言》、美国弗赖伯格1977年发表的《毛泽东的军事辩证法》、美国霍勒布尼奇1977年出版的《毛泽东的唯物辩证法》等。这些作品，主要从毛泽东哲学的辩证的方法、认识论、军事哲学的价值和贡献方面比较公正地、客观地评价了毛泽东哲学思想。

在文献资料整理方面的毛泽东研究的成果有：1973年施拉姆编译的《毛泽东同人民的谈话》，书中收入了毛泽东在1956年到1971年的谈话与书信；1974年施拉姆编纂的《未发表的毛泽东讲话》由美国企鹅图书出版公司出版；美国布朗大学翻译了一套英文毛泽东著作的多卷本。1979年3月在德国出版了毛泽东著作的七卷本，其中第1卷包括1949-1955年间的文章，第2卷包括1956-1957年间的文章，第3-6卷是1958-1976年间的文章，第7卷是评论文章汇编。

四、20世纪80年代至今：反思转折阶段

20世纪80年代中苏关系改善后，苏东的毛泽东研究愈来愈尊重事实，客观公正，对毛泽东及其哲学思想给予了中肯的评价。前苏联的米哈尔·格鲁贝1981年出版的《毛泽东的遗产》、原南斯拉夫的M.彼得洛维奇1982年撰写的《从马克思到毛泽东》比较详细地分析了毛泽东《实践论》、《矛盾论》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中的认识论和辩证法思想，肯定了它们对于中国革命进程的重要意义和价值；P·西米奇1986年撰写的《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则比较系统地分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含义；1992年俄罗斯《远东问题》杂志1、2、3期合刊上刊登了科瓦廖夫所写《斯大林同毛泽东的对话》；1993年《新时代》杂志发表瓦西里·西季赫梅诺夫的《毛泽东同斯大林、赫鲁晓夫的关系》等。

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作出了全面总结和评价，加之改革开放以来逐渐公开了更多的史料，新出版了毛泽东的各种著作，西方学者据此开始反思过去的研究，在此基础上的研究更加客观、更加公正、更加深入了。

这一时期主要理论成果有特里尔的《毛泽东传》（1980年）、弗朗西斯·苏的《毛泽东的辩证法理论》（1981年）、沃马克的《毛泽东政治思想的基础：1917-1935年》（1982年）、施拉姆的《毛泽东：一个初步的再评价》（1984年）及《毛泽东的思想》（1989年）、迈斯纳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主义与乌托邦主义》（1982年）及《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1986年）、麦克法夸尔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5-1965）、（1966-1982）等，澳大利亚的格雷姆·扬尼克·奈特的《毛泽东的〈矛盾论〉——对解放前的版本的注释》（1981年）和《毛泽东论辩证唯物主义》（1990年）、雷蒙德·F·怀利所著《毛主义的出现：毛泽东、陈伯达及其对中国理论的探求（1935-1945）》（1980年）、S·利斯所著《毛主席的新衣：毛和文化大革命》（1981年）、施拉姆所著《毛泽东研究：回顾和展望》（1984年）、泰维斯所著《中国的领袖、合法性与冲突：从超凡魅力的毛泽东到继承政治》（1984年）、施拉姆所著《毛泽东的思想》（1989年）、K.盖公尔所著《毛主义的形成》（1990年）、H.齐克所著《毛主义的兴与衰》（1990年）。

90年代以后，麦克法夸尔相继出版了《中国政治：毛泽东与邓小平时代》（1997年）、《中国后毛泽东时代改革的悖论》（1999年）。另外他所著《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一书，是国外研究中国“文化大革命”发生原因的一部颇有代表性和影响广泛的专著，全书共分三卷，一百多万字，其中第一卷、第二卷分别于1979年和1983年由牛津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联合出版，并于1988年译成中文在中国出版；第三卷已于1997年出版，但尚未出现中文译本。2006年8月，麦克法夸尔和沈迈克合著的《毛泽东最后的革命》（Mao's Last Revolution）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在本书中，他与沈迈克教授（瑞典隆德大学）以近800页的篇幅，再度深入探讨了文化大革命的起源问题及其详细过程。耶鲁大学历史系史景迁教授写的英文版《毛泽东传》，目前尚无中文版译出。



综观国外毛泽东研究的历史进程可以发现，毛泽东思想的研究与毛泽东思想形成和发展的成熟程度关系极为密切。正是随着毛泽东思想的成熟和研究的多方面展开，毛泽东的国际威望提高，毛泽东思想在世界范围内得以广泛传播，才促成了国外毛泽东思想研究的热潮。国外毛泽东思想研究理论成果，为我们开阔视野，活跃思想提供了平台。

注释：

[1][2][5]陈葆华：《国外毛泽东思想研究评述》，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5页、第15页、第26页。

[3]韩荣璋、肖德才等：《毛泽东思想研究五十年》，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14页。

[4]费正清语。转引自韩荣璋、肖德才等：《毛泽东思想研究五十年》，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18页。

[6]斯特朗：《毛泽东的思想》，孟展译，光华书屋印行，1947年4月。

[7]陈裕平译：《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回忆录》，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9-10页。

[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国外研究毛泽东思想资料》编辑组：《国外研究毛泽东思想的四次大论战》，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81-82页。

（贾金玲，洛阳理工学院社会科学系教授。原载《国外理论动态》2011 年第 4 期，原文链接：http://www.cctb.net/llyj/lldt/hwzg/201105/t20110526_28155.htm）

【返回目录】



7-7 ANDREW ROSS：毛泽东对西方政治文化的影响



“今天的中国知识分子很可能难以理解西方对文化政治的热烈辩论竟然会与毛泽东有关，但是在中国成为西方衣柜中衣物的主要出口商之前，毛泽东主义就已经先出口到世界人们的心灵衣柜。”

摘要

在中国，人们对于毛泽东遗产的保存和记忆是带有选择性的，尤其是对“晚年的毛泽东”——他被官方定性为“错误地”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在西方，我们记得毛的思想对冷战时期左派和 1968 年这一代人令人激动的冲击，但是我们很少理解其对 1970 年代以来文化政治格局的影响。70 年代以来西方左右翼之间的文化斗争（Cultural Wars）开展得轰轰烈烈，有着一系列引人注目的运动和事件。本文将通过考察历史的案例，尝试描绘毛泽东对教育改革、文化和社区的社会运动以及立法变迁的潜在影响。毛的教诲，如自我批评、青年造反、提高觉悟，在西方有着比中国更长久且深远的发展，目前仍在进行的一系列左派辩论，诸如提倡文化正义还是社会正义更为优先的问题，其实亦带有毛泽东思想的色彩。本文的结论是毛泽东思想的输出，无论在文化大革命中还是在文化战争中，对于我们如何全面理解文化与政治的关系的变化有着重大贡献。

在中国大陆，每过 10 年，在伟大舵手诞辰纪念日都会爆发一阵毛泽东热。中国领导人举办纪念活动蕴酿出毛泽东热，然后又小心翼翼加以控制防范，以防其扩展太大而不可收拾。1993 年，民众藉庆祝毛泽东百年诞辰大肆购买印有毛泽东肖像的消费品，包括打火机、钥匙

圈，有些商品具有公开嘲讽的意味——毛的肖像充斥世俗的劣品市场，瓦解了其伟大人格对一般民众的魅力。权延赤写的畅销书，书名就是《“走下神坛”的毛泽东》。那些在毛时代长大的人们正面临令人迷惑的社会变迁，毛的百年诞辰则是他们表达对五十年代社会和谐与国家稳定的怀念的大好机会，重温新生社会主义国家的荣光（或对长辈而言，社会解放本身的艰辛过程），让人可以略过毛晚年热衷于纠正错误的运动这一棘手问题。

不研究文化大革命就不可能正确对待中国革命历史

尽管时间一晃已十来年，但如何认识晚年毛泽东仍是一个极富于争议的问题。比如，对于文化大革命（官方定性为主席的“错误”）的独立研究仍旧或多或少属于政治禁区。毫无疑问的是，这有助于让人们把眼光望向未来，把心思放在照耀中国前程、如气球般日益增大的 GDP 统计数字。但这一道禁令对于国民心理有很不利的影响。只要这个议题被视为禁忌，中国就不可能正确对待其革命历史，亦或是现代化。下乡知青（被送到农村接受农民再教育的知识市民和红卫兵学生）用夸张的修辞语言要求讨回他们的青春——或要求从年龄中「扣除十岁」是一回事，而把整个十年从中国人民的历史中删去则是完全另外一回事。

2003 年冬，毛泽东一百一十周年诞辰纪念有了似乎更富于人情味的焦点。一大批传记与电视纪录片将毛泽东描绘为家中凡人或是内心充满挣扎的领袖（至少在官方看来，毛仅有七分正确，毛对斯大林的评价是七分功三分过，中国目前的统治者为了方便也依样画葫芦，把毛的功过三七开）；一首饶舌歌（rap songs）的作者试图把毛泽东的教诲传达给年轻人，在今天胡乱盲目消费文化氛围下，这是一项很困难的工作，特别是因为这首歌提倡毛的「两要」，原意是要保持「谦虚谨慎，艰苦奋斗」；中共中央党史出版社出版了四卷本的以毛泽东思想为基础的企业管理和商战教程，这充分体现了商业文化在中共党内的普遍影响，这套书吸取了毛在哲学，政治，军事策略上的著作思想，为如何管理商业项目，签订协约，调动员工积极性和扶持新公司献策献计。

另一方面，胡锦涛上台后，实行稍加重视人民利益的政策，普遍认为当前领导阶层之所以热衷于纪念毛泽东的诞辰，是胡锦涛有意藉此更加显示他有别于前任的主席江泽民。一些没有变节的毛主义者则趁此大好时机要求将毛泽东诞辰定为国家纪念日。他们所建立的“毛泽东旗帜”网站（www.maoflag.net）吸引了众多的人流，公开宣称“高高举起毛泽东这面伟大旗帜，为建设一个真正独立、安全、统一、民主、文明、富强的社会主义中国而尽自己一份力量”。 我休假到中国待的一年期间，平常几乎看不到毛泽东的信息，这次却在网络上突然爆发出如此超乎常态的热烈关注。

2003 年 12 月末，我受邀在武汉召开的毛泽东纪念会上演讲。武汉是毛 73 岁时畅游长江之地，毛在这里有一处居所。当时，我对于中国年轻一代对文革的了解之少而感到震动，当然，我对此并不觉得非常吃惊。听众中有些是来自武汉地区高校的研究生，当我问及武汉 720 事件（这次造反派与当权派的冲突对文化大革命的走向起了重大影响）的时候，他们坦承对于此事毫无所知。毫无疑问，官方阻拦人民对于那骚动年代的记忆应对青年人的知识缺口负大部分责任，但中国当前的政治与社会气氛亦无助于历史记忆的复原和充实。

“毛泽东思想”为何在文革后仍深深影响西方学术文化界？

今日，民众支持中国的现代化政策与文革领袖们斥为“经济主义”的物质欲望和需求密切相关。这个官方名为“小康社会”的目标之能广被接受，靠的是社会主义不必等同于匮乏与贫穷的想法，这种想法与当年激励学生成立红卫兵把地方党干部赶下台和效法他们的工人造反组织的政治精神，有天壤之别。由经济主义驱动的社会与由政治挂帅的社会，其间的差异可概括在邓小平于 1978 年给中国人民提出的“新政”：你可以有经济自由，但任何其他形式的自由则免谈。今天政府最热衷的工作便是定期发布外国直接投资或是贸易数额的增长，这就使毛泽东下令造反的浪漫诗情不能不激发一些青年人的心灵。

青年人激发的热情将把中国未来导向何方？这不是本文所要讨论的问题。自 1989 年天安



门事件之后，中国的统治者花了很大力气尽量削弱学生与工人之间的联系。这种联系对于现有的统治格局具有潜在的威胁。我也不想效西方的左翼东方主义者们（Orientalists）之所为，令人厌烦地为浪漫理想化的共产主义消逝而感伤不已。相反，我将集中讨论毛泽东思想的输出，特别是毛思想对西方社会思潮与教育的影响。因为“毛主义”一辞包含了至少跨越三个不同历史时代的政策与倾向——延安时代的具有钢铁般纪律的共产党先锋队；国家社会主义的英雄时代；文化大革命运动时期——在此我不能一一阐述每一时期毛对西方的影响，我将着重讨论毛泽东的思想创新对广义的文化政治的影响。

尽管“毛泽东思想”在中国仍是大学必修课程，但大部分毛所提倡的政治、经济、文化政策在今天的中国是无法想象的。今天中国的发展方向，与 50-60 年代毛主义鼎盛时期所坚持的共产主义信仰、独立自主发展经济、蔑视市场力量截然相反。在西方，我们亦鲜少知道毛思想对于我们政治文化的影响。

十多年前，在我经手主编的一套丛书中，一位在美国大学教书的华裔影视学者周蕾（Rey Chow）提出了一个令人深思的批评观点。她指出，在全世界，文革至今只有在美国文学与文化批评界中生机勃勃。文革中周蕾女士在香港长大，曾亲眼见到尸体不时从中国内陆飘浮至珠江口，她很难以理解在美国学院批评家中竟然存在文革红卫兵式的思想习惯和方式。这些包括对一切西方事物未经思考即反射式的怀疑，道德指控的本能，以及坚信唯有受害者才能说真话。（注一）我仔细思考了这些问题，觉得周蕾的批评或许是有道理的，但未见得是因为她所引用的那些理由。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之所以在西方人文学术界受到欢迎，原因并不只是因为西方学者对于文革真实面貌的无知。下面我将说明原因。

没有人会否认西方当年所接触到的毛泽东思想是以高度理想化的面貌出现的。事实上，我们所理解的毛主义与中国所经验到的不断变化的毛主义有着非常大的不同，尤其在农村集体化运动、大跃进与文革方面。因此，了解接受毛主义的时代背景和历史条件有时比了解其主义体系本身的说服力和逻辑性更来得重要。在 1950～1960 年代的西方社会，颇不乏理由认为，只要驾御得法，这阵东风可成为一股扫除资本主义社会结构性腐败的伟大力量。在某种程度上，他们赋予新中国的活力仅仅是马克思有关“亚细亚生产方式”概念的反面。在这一概念的想象

中，一个死气沉沉、生产力低下的“亚细亚社会”从俄罗斯东岸一直延伸到阿拉伯海的封建体制。现有的历史研究证据表明，一直到 19 世纪，中国繁荣昌盛，城市化和技术水平都很高，这很难不让人下结论说，所谓静止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其实是马克思主义所有基本概念中最富有欧洲中心主义色彩（Eurocentric）、最可笑的一个。马克思认为“亚细亚生产方式”长年昏睡不醒，西方的中国专家则认为，中国经毛泽东“唤醒”后，生机勃发，无可限量，两者所见截然不同，其实只是同一种东方主义（Orientalism） 思维相反的表述方式而已。

尽管如此，要不是在 1960 年代末的文革进程中一波方平一波又起，反复循环地发生造反和镇压的派系斗争，让西方那些真想追随毛泽东路线的人摸不清实际情况，毛独特新颖的思想对他们的吸引力，本应该快速退潮了。

把毛的吸引力浓缩于年轻一代人所喜闻乐见的媒体意象中则要相对容易得多。在贝托鲁其（Bertolucci）〈译按：意大利著名导演，有《末代皇帝》等作品 〉最近导演了一部 《梦想者》（The Dreamers），用苦中带乐的方式赞颂 1968 年 5 月的反叛运动，电影里的一位主角说毛泽东是一个把中国当作大舞台来上演一齣波澜壮阔的历史剧的天才导演。哇！导演让我们自己来判断这部电影究竟是他对这位主角的天真幼稚所发的严峻评论，还是反映 1968 年西方社会氛围的令人亢奋的样本。

不论如何，贝托鲁奇的回顾反思情绪在今日相当普遍。今天大家通常认为，西方青年对毛泽东、格瓦拉以及胡志明之类的第三世界领袖偶像的着迷只是一时的喜好罢了，与第一代崇拜摇滚明星的人同调。那么，在毛泽东热的最高潮过去了 30 年之后，像周蕾所说的毛泽东的精神仍主导西方文学与文化批评家的心理，这又究竟为何呢？这难道仅仅是塞义德（Edward Said）所称的“理论旅行”（traveling theory）——即一些思想在某个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发芽成长，但随着时间的流逝，却在另一个新环境中获得了完全不同的意义——的另一个例子吗？或者，我们能从过去几十年来对政治和文化的关系的认知中，学到一些更经久的教训？

“毛泽东思想”影响西方人文学术界的历史背景

让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历史背景。1960 年代初，毛泽东与莫斯科决裂，大略反映了他逐渐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在世界的许多地方受到赞扬，认为这是把共产主义理想从斯大林体制死气沉沉的官僚统治中拯救出来的大好机会；毛泽东爱走基层民众路线，热衷发动民众继续革命，亦被视为明显不同于苏联依赖由科技精英指导的都市工业化道路；毛泽东会对中国共产党的同志们说“我是中国土产的哲学家，你们都是外国哲学家”，尤其对莫斯科妄自尊大自以为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上的各方面都是权威，更会这么说。他的这种思想倾向深获西方那些反对其自身社会由好战的的专家官僚严密管控的人们欢迎，同时，毛强调自力更生，力主区域平衡发展，提倡来自农民生活中的“有机专家 （organic experts）”，这与当时新兴独立的第三世界国家力图不仅摆脱旧有的殖民霸权，也要破除冷战架构下美苏主控的体制正相合拍。毛主义对第三世界左派的影响最为持久，但是，对西方工业社会那些正寻找取代冷战的生死斗争的异议者，中国社会主义的另类发展模式与他们自己另择发展道路的追求不谋而合。

在西方，毛泽东反苏联的形象日益受欢迎，这主要是因为他终身信奉矛盾。外国人以为毛想固守田园式的社会，其实不然，他从未停止鼓励发展斯达汉诺夫式（Stakhanovite）生产力与快速工业化（他疾呼：“我们必须两条腿走路”）；他也从未忽视那些通商口岸（例如上海），但却同时力促其他内陆地区的城市化以共享发展的利益；他虔信农村大众的革命潜能，同时又坚持列宁主义的政党中央集权。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在他偏离自身信念与党的官僚体制对抗而激发文化大革命之时，树立了在异国的偶像地位。

逸离苏联的经济模式使毛泽东赢得外国人士的赞美，几年后他转而关注文化则真正点亮了全世界的灯塔。1949 年中国战胜封建主义与帝国主义，1950 年代将资本主义企业国有化，深刻改变了中国的经济基础结构。但毛坚持认为经济变革是远远不够的。旧体制的思想残余仍存在社会的许多部门——被剥夺的地主、资本家，小农、买办、流氓、官僚、教师及从民国遗留下来的职员和专业人士。毛认为最大的威胁来自于“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许多人在政府，工业界和其他国家机关占居高位。总而言之，中国的大多数人仍旧倾向依照革命

前的旧意识形态与思想方式来打造新中国。所以，决定中国革命方向的殊死战可能会发生在意识形态领域内，将在那些对下一代人的成长具有影响力的人们中展开。

从理论上说，这场斗争可以有许多战斗方式，毛泽东选择了特别震动人心、激起年轻人热情的途径——炮打司令部。他宣称，真正的进步必须以公开的批评作为条件，必须打倒和取代那些占据党内、教育界及文化界高位、对年轻人施行反动教育的那些人。我们今天回头来看，当时这些学生——当中许多仅是中学的青春少女——接受毛的指示的热情是相当惊人的。在一个盲目服从老师的文化中，质疑师长的权威、甚至对其施予体罚，这大大的违反了原有的社会习俗。相形之下，同时期西方年轻人的激进主义则是比较谨慎的（尽管有许多令人惊异的新形式），因为他们大可从波西米亚式（Bohemian）的异议传统汲取经验。

“毛泽东思想”对西方的重要影响

尽管如此，文革的范例给了西方学生将目光转向学校权威与课程设置的额外理由（当然这不是唯一的理由）。炮打司令部以及课程的政治化成为大学校园运动的日程，结果是鼓舞了一连串延续至今的改革浪潮。同时，毛泽东的文化革命概念的理论内涵和新兴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亦相辅相成，最明显者如法兰克福学派的教诲。毛批评苏维埃经济模式的目的虽与西方激进思界不同，但亦获得那些长期质疑正统马克思主义的机械经济决定论的思想家的回应。有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超越传统的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僵硬决定论，发展出对权力与抵抗更缜密更复杂的分析，毛泽东强调文化的重要性，与他们有如同声相应。尽管发生的理由和背景全然不同，在西方激进学界，文化与媒体机构——即阿尔都塞（Althusser）著名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es），成为争论与冲突的目标。

对毛而言，转向文化完全是策略性的手段。面对走资派暗地助长资本主义复辟，发动文化大革命保卫中国共产党取得政权后的革命果实是完全必要的。人们期待立竿见影的成果，经此形成新型的社会主义品格、社会习俗以及日常生活作风，至于在西方，向文化的转向则处于完

全不同的历史环境，它召唤对抗那些确保民众同意社会和国家中的掌权者统治的机构；在中国，毛主义的运动由超越国家权力的最高魅力型领袖所发动，对国家和官僚政治的坚固堡垒发起攻击，西方青年爆发的异议运动则是由一群将接掌国家权力却不屑于社会既定工作的年轻人所促成。这两种环境上的差异或许可以部分地帮助我们理解文化政治后来在中国以及在西方所展现出来的差异。

除了对权威的攻击之外，毛泽东思想的许多方面在西方也受到广泛欢迎。例如“自我批评”就成为白人对自身特权的反省，进而快速扩大引用至个人对自身阶级、性别与性向特权身分的反省。这甚至成为一种惯例，演说者在演说前先为自身可能因此种身分特权而受到限制的观点而致歉。渐渐地，自我批评成为大众心理疗法与自助（self-help）当中重要的忏悔仪式，由此可见其已深入主流生活。同样，文革对青年运动的注重，亦与所谓的婴儿潮一代（baby boomers，即二战后出生的一代）的代际政治（generational politics）产生共鸣。对年轻人而言，反叛成为一种“权利”，虽然它今日可能在对商业品牌的选择中更为重要，但这一潮流仍很有生命力，也再次证明其对主流的影响力。在中国农村推动的“忆苦思甜”运动中所常用的提高觉悟方式，对第二波女权运动（second-wave feminism）有重大的影响力，从此其影响亦扩展到其他社会运动，而成为提升弱势阶级自尊的有效方法。总之，这些以及其他毛思想的原则在西方有着比在中国更长久与更有成效的发展。

至于毛泽东本人，你可以从他身上几种不同的引人之处选择。对西方知识分子而言，毛吸引人之处在他应付时事的善于谋划。毛制订策略的原则不是直接引用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生搬硬套到所有事物上，这是一套富有创造性的策略原则，目的是打败相继而至的不同敌人（殖民主义者、蒋介石国民党、日本占领军、苏联霸权以及中国共产党内的走资派），这套原则出自一位从战场上获得军事战略家声誉的诗人、哲学家。对中国作家与艺术家而言，亦正是毛的实践精神部分地防止了把毛式美学完全变成“为人民服务”的僵硬教条。这种情形，在毛著名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被奉为国家文化政策之后，尤其在他的妻子江青积极推广样板艺术形式（如样板戏）之时，是很有可能发生的。

对外人来说（甚至对很多中国人自己来说），如何理解此类实践的具体中国环境不是一件

那么容易的事情。鲜有人可以完全了解“两条路线的斗争”的复杂性，这是毛主义的政治核心，也是理解路线变化的关键。“两条路线的斗争”这个词通常被毛用来描绘党内阶级斗争的表现，亦即走社会主义道路者与走资本主义道路者的持久斗争。由于长期受到辨证法的影响，毛泽东的理论常常被刻意拿来解释或强调表面上的二元对立或矛盾。

以早期的延安时代为例，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区分了解放区与国统区的文化政策。这主要是是一个策略上的区分，而非提供给士绅文人“为人民与革命服务”的普遍指导方针（后来鲁迅评论道，“为革命服务的作家就象是一个人两脚踩在两只船上”，即一只是“革命”，一只是“文学”（注二）。更较为人知的例子是毛泽东的矛盾论，最早（1930 年代末）是为了适应党内政策由国共对抗转向国共合作抗日。在 1956 年的赫鲁晓夫报告之后，这个理论出于对苏联的敌意升高，又重新解释，最后导致中苏分裂。从 1957 年的反右运动开始（此运动打击了“百花齐放”中“背叛”毛的知识分子），乃至到文革之末，这一理论都用来证明发动全国运动以解决“人民内部矛盾”是正确的。因此辨证唯物法的核心论述——毛总结为“一分为二”——越来越只用来区分忠诚的人与走资本主义复辟道路的人。

西方左派对待毛主义的态度各有不同

除了一些宗派团体戮力理解并捍卫毛式教义内涵的每一次变动外，大部分西方的诠释者比较喜欢根据自身的需要来灵活理解和阐述毛泽东思想。西方对待毛主义的态度也并不一致，例如在我出生并成长的英国，托洛斯基主义在学生与工人的政治先锋中有更大的影响力；在法国，广大的左翼深受毛主义的影响，一些组织例如「革命万岁」（Vive la Revolution）和「无产阶级左派」（Gauche Proletarienne），其宗旨则是典型的反对任何威权、反对官僚，其实或许与中国事务全然无关，从根本而言，卢梭、普鲁东和索列尔（Georges Sorel）（注三）的思想遗产决定了法国对毛思想的接受方式；与此相反的是，美国的一些毛派团体例如激进劳工党 （Progressive Labor Party），革命共产党（Revolutionary Communist Party）以及马列共产党（Communist Party （ML））则相当强调道德和等级，他们的组织基本上是列

宁主义式的，他们的争论往往反映或折射出中国的政治派别斗争。法国的毛派较受无政府主义与自由主义传统影响，因而接受文化激进主义；美国的毛派则常常与处于萌芽期的社会和文化运动相左——如反主流文化运动 （counterculture）、女权主义、同性恋运动、与种族分离主义等等，美国毛派人士往往向他们所认为的无产阶级的文化保守主义看齐，所以他们的服饰打扮、行为方式和宣传模式皆与此一致。对毛主义的许多更富创见的解释其实主要来自少数族群的民族主义者，例如黑豹党（the Black Panther）以及亚裔、拉美裔以及印地安原住民。在“内部殖民地”（internal colonialism）理论的指导之下，他们认为黑色，黄色和红色美国人实质上是不发达殖民地的居民，与第三世界人民相似。他们选择性的运用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例如自力更生，“为人民服务”，文化建设，以及对抗行动等等。

毛主义对美国教育、学术、文化与社会运动的影响

在美国，这些民族主义团体有着明显的分散化和以社区为组织基础的倾向。这意味着新毛主义为人民服务的观点已渗透到社会之中，已被本土化，不再只是精英知识分子或先锋队专有的。这样的思想扩散，其影响比中产阶级出身的干部到工厂当组织者，更为深远，尤其那些工厂组织者往往如同中国文革中下乡或去工厂的城市知青对其努力感到挫折。在美国这一实践主要为大学生民主社会协会（Students for a Democratic Society）（注四）学生所采纳。正如在中国，其中一个最主要的目标是为了打破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区分。但在美国，这个理论在经济快速变迁的汪洋大海中搁浅。1970 年代早期，发达西方社会进入了一个走向后工业生产形式的长时期结构调整时期，制造业生产逐步下降，非物质形态的附加价值劳动则越益重要。因此，传统的工人自我认同受到侵蚀，无法再宣称自身为迈向更美好社会的发动机。中国要到 1990 年代「铁饭碗」被打破之后，类似的情况才发生。但在中国，工人群体及其利益对国家政策有相对比较强劲的影响力。

在教育领域则是另一番情况。大多因为文革中断了一整代人的教育与学习，毛被认为是反教育，就像他现在被认为反知识分子一样。这两种看法都不准确。文革开始后两年，大学重新

开放，教育制度的变革开始了，一切都在变化，从学校管理到教科书、课程准备，以及招收工人农民入学等等。总而言之，这些变革是在实践中进行的，而非仅是受抽象理论的指导。在西方，尽管没有建立起工人大学，但中等和高等教育的改革致力于使课程与教学方法尽可能的大众化，更可理解，更实际，更符合社会弱势群体的需求。毛的教育思想与杜威和 Paolo Freire（注五）是同条共贯的。

更重要的是整个一代的左翼运动积极分子进入大学教职的行列。和那些进入工厂的干部相比，更多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进入了专业工作的行列，选择 1970 年代初期称为「体制内长征」（the long march through the institutions）的道路。他们下决心进入「上层建筑的专业工作」——例如教育、法律和艺术等那些对于重塑国家和民族文化最为重要的领域。

正是在这些人文学科领域——尤其是在其中最精英的地方——新毛泽东主义的脉搏持续跳动逾三十年，在文革热潮早已退去之后依然不衰。在这个圈子内，法国知识分子诸如萨特（Sartre）、阿尔都塞（ Althusser）、罗兰．巴特（Barthes）和傅科（Foucault）等享有巨大影响。这些思想家的思想成长曾深受毛主义的影响，他们的思想对美国的文化批评界有着深远的影响。当年在美国，许多人把法式的毛主义口号和教诲视为神圣律令。回顾起来，这种现象在今日已难以令人置信。

与此同时，新毛泽东主义的影响逐渐渗入社区生活，开始以代表大众要求文化认同的面目出现，涵括种族、族群、女权主义、同性恋及环境保护运动等各方面。这些社会运动各有各的诉求，但又互相联系，可谓是百花齐怒放。这些运动对立法的影响并非立竿见影，而通常须历经数十年的司法诉讼，但它们在教育界的变革却有着直接的影响。文化批评家以及历史学者站在斗争的前线，努力修改各类教科书，提倡新的文化认同观念。最终结果是大大翻修了构成国家文化核心的半官方准则。在多元文化论者大幅改写了历史书籍中的白人男性精英观点后，一些新兴的批评学派，如酷儿批评（queer criticism）、生态批评与后殖民批评等等，也加入战斗阵容。教科书为了跟上不断更新的的认同典范而一次又一次的修改。这个过程远远没有结束，在某些未显示的方面，已体现毛泽东思想中“不断革命论”的精神。就如同我先前举过的西方的大部分例子，影响它们发展的有几种思想，毛主义只是其中的一系，但我要说的是，毛

主义的重要性却一直受到忽视。就最低限度而言，这些批评家的主将自认为他们所作的这些“上层建筑”的改革是激进的、甚至革命性的，本质上，这就有着很明显的新毛泽东主义热情的痕迹。

美国新保守派发动“文化战争”攻击进步思潮

并不是每个人都将这些变化视为进步的，事实上，有些人将此视为破坏力量，联想起文化大革命中的的黑暗面。这样的反挫不只来自右翼，也来自左翼。自 1980 年代晚期开始，美国新保守主义者发动了所谓的“文化战争”（Culture Wars），直至 90 年代中期，左右翼在文化问题上的争端吸引了全国极大的政治关注。在有关国民道德的辩论中，美国的“文化战争”为其他国家的保守主义者们提供了一个可效法的模式。争论最初系针对学校该教授何种教科书，但很快地扩展到社会和文化生活的每个角落，挑起对“少数族裔优待计划”（affirmative action）、性骚扰、同性恋权利以及各种工作场所歧视的争辩。这样，冲突从通常处于非政府领域的文化政治问题，逐渐扩展到我称之为文化正义（Cultural Justice）的范围。在这些方面，争取承认公民权的斗争需要有国家行动的介入。

因为左翼文化改革者对主流历史观念的修正方便煽情报纸的炒作，因此改革者粗糙的漫画式形象在媒体中广为流传。新保守派分子将 “政治正确”（political correctness） 重新定义的策略奏效〈编按：美国多元文化运动主张尊重多民族的语言文化，反对西方白人男性中心，要求不得使用歧视妇女、有色人种的措辞，谓之“政治正确”，但保守派刻意扭曲其意旨，攻击“政治正确”论有违言论自由，具极权思想，更把“政治正确”搞成讥嘲的贬词〉。连某些左派人士也发言反对保守派所说的“政治正确”，他们大部分是某一代的白人男性，认为自己过去左派主将的身分被剥夺或取代。就像保守派的文化战将一样，他们始终怀恋着从前的年代——在那个时代，政治目标清楚，而群众基础亦大致稳定〈这其实大部分不实在〉。这些左翼老将斥责今日年轻人仅有短视的政治热情。在他们写的某些逸闻掌故中，要求改革的学生被形容成像当今的红卫兵，怀着自以为正确的狂热，激动地追击犯了政治不正确的罪孽的倒霉老师。

如果我们能撇开这些是是非非暂且不论，这中间的确有非常严肃的问题值得左派深思。对文化改革的热情是否真的分散了本来可以用来变革社会和经济不平等的精力？或者说，文化变革是否是社会经济变革的必要条件？那些持否定意见的人士认为，由于“上层建筑”的变革并不扎根于经济基础之土壤，因而不足以改变广大无产阶级的生存状态。此外，他们认为文化更多的是导致人们的分裂而非导向团结。另一阵营的拥护者则坚持认为社会与文化认同是在收入、医疗、教育、自由结社、宗教自由、住房与工作上获得平等机会的条件。从这一观点出发，文化自尊是言论、集会与社会良心自由等基本人权的必要补充。许多人认为获得社会承认的权利与获得社会薪资几乎同等重要。

文革的目的在创造“社会主义新人”

无论你我的立场为何（我倾向后者——虽然我认为不可能，至少也是浪费时间，去区分这些政治的差异），整场辩论都可得见毛主义的味道。在完全不同的环境下，中国的文革批评者也做出类似的批评——文化不能当饭吃，而文革的拥护者则坚持革命不能被贬低到追求增加薪资或物质利益的经济主义。有人回顾文革甚至还认为文革走得不够远，认为毛泽东过早的收住了革命风暴的缰绳（这一观点对现在的某些读者来说可能无法理解，因为许多人在文革派系斗争中丧生）。尽管在文革中毛将中国的知识分子作为打击对象，但作家与文化批评家在事件的进展中仍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虽然西方的知识分子在文化战争中不至于像中国知识分子那样有生命危险，但文化工作者与管理者亦尝到第一线的痛苦、甚至残酷的反控。

这些日子来，已惯于把保守派运用文化战争的策略看成右派如何挪用左派政治策略的一个例证。换言之，新右派把握了葛兰西有关文化霸权（hegemony）理论的精义，掌握主动权，夺回失去的阵地。在这种情况下，右派的文化战将实则是真正的毛派，他们是政治上的功利主义者，狡猾的利用文化议题以达到自身利益。毕竟，难道毛泽东不正是利用文化来发动一场不久即失控的整风运动，以重新夺回党中央的至高无上的权力？



这一说法乍看似有说服力，然其分析的论证依据是假设毛泽东将文化视为工具，即毛将文化视为权力游戏的载体。对那些念念不忘文革亵渎文物和机构与迫害妨碍文革的文化工作者的人们而言，看不出毛泽东对文化的观点与纳粹主义有何不同。但是，文革所指称的「文化」主要并不是指书本或艺术家，它与改造人的主体性更有关联。培育新的社会人格和心态的努力取决于是否能彻底清除自身内部的资产阶级思想。在这方面，毛的先辈是如葛兰西这样的思想家。葛兰西提出社会主义的目标是创造“新人”，与毛同时代的切．格瓦拉也提出类似的“社会主义新人”的概念。

西方可以充分运用毛主义的遗产

如果正如本文所力图证明的那样，西方左翼文化政治的道路的确受毛主义宏伟的抱负影响，它却只能在一个备受限制的环境下始终谨慎将事。但令人可喜的是，整个社会变革和改造规划的精神不仅保留下来，更延伸到清除资产阶级思想以外的新领域，如废除家长父权和异性恋霸权，以及白人中心主义等等。除了那些由基督教原旨教义派所驱动的人（那种也许才是最纯洁的认同政治形式），右派的文化斗士并没有可堪与毛主义比拟的蓝图，他们最主要是受反动的精神驱动。

我之所以提出前述的观点，并不是说我们可以或应该把西方文化战争的环境和中国的文革直接加以比较。这种比较是毫无意义的。但是，中国的文革对西方的文化政治的确有着实质性的影响，可悲的是这种影响常常被忽视不见。全面研究理解文革对中国的学者有极大的价值，对于中国学者来说，文革年代还是一个禁区，有待来日档案解密之后，才能充分探究。

这样看来，思考中国的文革如何进入世界思潮，改变我们对文化事务的社会政治意义的思考，这远比将其视为中国共产党的党内争执来得有意义多了。从某种意义上说，文革对世界政治文化情势的影响以地下潜行的方式持续着，尽管在其原诞生地中国，它的声音已相当微弱。今日中国的官方观点认为有关文化政治的争辩已不再重要（特别是在 1980 年代的“文化热”

消退之后）。大体而言，文革被中国主流话语视为纯粹是一个对外封闭的国家内部的产物，当今的全球化之风早把它吹得无影无踪。今天的中国知识分子很可能难以理解西方对文化政治的热烈辩论竟然会与毛泽东有关，但是在中国成为西方衣柜中衣物的主要出口商之前，毛泽东主义就已经先出口到世界人们的心灵衣柜。相较于中国的武汉，今日在西方我们却拥有更多空间可能充分运用毛主义的遗产。

注一：Rey Chow, Writing Diaspora: Tactices of Intervention in Contemporary Cultural Studies（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3）.

注二：鲁迅的原文是，"有些'革命文学者'的本身里，还藏着容易犯到的病根。'革命'和'文学'，若继若续，好像两只靠近的船，一只是'革命'，一只是'文学'，而作者的每一只脚就站在每一只船上面。当环境较好的时候，作者就在革命这一只船上踏得重一点，分明是革命者，待到革命一被压迫，则在文学的船上踏得重一点，他变了不过是文学家了。"（见《上海文艺之一瞥》），校译者注。

注三：Georges Sorel （1847-1922），法国社会理论家，主张工团主义、无政府主义、和暴力哲学，校译者注。

注四：Students for a Democratic Society （SDS），60 年代末 70 年代初美国新左派运动和民权运动中最重要的左翼学生团体，校译者注。

注五：Paolo Freire （1921-1997），巴西教育思想家和社会实践家，其《被压迫者的教育学》（Pedagogy of the Oppressed）一书对西方新左翼运动有很大影响，校译者注。

译自：《Cultural Politics》2005 年第一卷第一期

（ANDREW ROSS，美国纽约大学美国研究教授。译：郑洛，载于《批判与再造》第 28 期。原文链接：http://t.cn/zjwwhcw）

【返回目录】



【洞见专栏】

于灵歌：中国当代政治领导的“中国特性”

11 月将是世人瞩目的“政治月”，中国与美国都将产生新一届的领导人。许多人都在关注，十八大之后中国的政治领导会给国家的内外政策带来怎样的变化。不过，中国人民大学国际政治学者时殷弘教授曾经分析，至少在新一代政治领导中，一些根深蒂固的“中国特性(Chineseness)”将会保持不变。

时殷弘认为，这些“中国特性”有的源自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传统，有的则跟当代的政治实践有关。具体而言，他列举了如下几方面的特性。

改革——当代中国的首要主题是改革。在新加坡华人学者王赓武提出的“中国特性”概念构建下，中国当代政治基本框架是追求政策的稳定性，经济改革更加系统化，目的和手段有明确性。时殷弘指出，与中国历史上的传统改革类似，当代改革也具有内在区分性，经过谨慎选择，但要更为精密复杂。

维护——源于中国历史传统的“维护(maintenance)”的观念也对当代改革者影响深远。正如历史上经历数次征服与反抗的王朝更替，经历了巨大的改革转型的当代中国如何维护统一、和平、稳定的状态，仍考验着政治领导的灵活性、持久性与统治能力。对于当下而言，维持国家统一与领土完整是“维护”观念的基本要义。

“统领宇宙的生物循环”理念——传统的“中国特性”对当今执政观念仍有影响。例如，基于“统领宇宙的生物循环”理念而产生的对于政治统治盛衰循环的认识，即一定的繁荣伴随着不可避免的衰落倾覆。正如胡锦涛总书记在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 30 周年大会上所言：“党的先进性和党的执政地位都不是一劳永逸、一成不变的，过去先进不等于现在先进，现在先进不等于永远先进；过去拥有不等于现在拥有，现在拥有不等于永远拥有。”



平等——平等问题是共存于历史与当今中国的一个“中国特性”矛盾悖论。中国传统的等级制社会中，不同的社会群体有不同的权利和义务，但也有一种基于“平等地面对特定情况和问题的正当性”。这样的矛盾悖论在当今与中国政府领导的公信力息息相关，例如人民对于平等公正的追求、对“以人为本”理念的支持，与社会中等级化的“官本位”政治文化有深刻的矛盾。在当代中国对外政策中，平等主义与等级秩序之间的矛盾也有所反映。一方面，中国几乎是当今世界上唯一仍然提倡和实践国际平等主义哲学的大国；另一方面，考虑到中国的规模、核心利益与大国地位，“大国外交”(great power politics)战略也屡屡被中外学者提及。中国对实际外政策中的“大国外交”，可以在诸如朝鲜、伊朗、达尔富尔、缅甸之类热点问题的行为方式中来理解。

道德——对道德的强调显然是中国的政治特色之一，它深深地植根于中国主流传统中。当代中国政治领导对道德的强调有其国内方面的原因：不仅为了修复文革中破坏的文化传统，也是为了抵抗改革开放后自由市场经济对社会伦理秩序、精神文明的负面影响。江泽民提出的“将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与胡锦涛的“八荣八耻”观都是重要的德治体现。在国际方面，伴随着中国的赫然崛起，胡锦涛提出了“和谐世界”理念，明示了中国关于世界秩序的道德政治理想。

对外政策的对内功能——时殷弘认为，相比起 1945 年或 1990 年以来的世界上任何其他大国，当代中国的对外政策有其压倒性的国内功能。这一“中国特性”十分有助于当代中国的“战略集中”，有利于中国近二三十年来非常突出的经济成长和社会稳定成就，也大大促进了中国总的来说较为保守的对外政策。未来中国在获取外部政治影响和权势方面大概也会进展较慢，而不是反其道而行之，急于事功。

对“中国特性”本身的信念——这是一项较为晚近的中国特性，即中国当代政治领导（且包括大多数民众）对中国特性本身（“中国国情”）以及自主维持、改革与发展实践的坚定信念。甚至可以说，这一信念就是当代中国的一项最根本的意识形态。历史地看，这一信念源自革命时期毛泽东坚持根据中国的特定国情决定中国革命的战略。改革开放以来，依靠结合国情

的自主实践，中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种成功提供了中国当代爱国主义的一大源泉，恢复了中国人民在“文化大革命”灾难之后的自信。

时殷弘认为，这些中国特性，无论是审慎的“维护”，抑或基于生物循环的盛衰理念，已经成为影响中国当今政治领导行为方式、对外政策的重要因素。至少在下一代政治领导中，大概仍将如此。而当代中国领导和人民最念念不忘的中国特性之一，则是作为“强大而脆弱的大国”——中国可能迎来辉煌前景，但也将面对若干重大而严峻的挑战。

【参考文献】

Yinhong Shi:”China’s Contemporary Political Leadership, Foreign Policy, and Their Chineseness.”East Asia (2011) 28:247–257,DOI 10.1007/s12140-011-9142-3

（本专栏由政见 http://cnpolitics.org/供稿。

原文链接：http://cnpolitics.org/2012/10/china-politics-chineseness/）

【返回目录】



【FMN 新闻】

中共十八大

历时7天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代表大会闭幕式14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进行，会议上选举产生了新一届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并对党章进行了修改，15日的十八届一中全会将产生新的政治局常委。习近平、李克强以及王岐山、刘云山、刘延东、李源潮、汪洋、张高丽、张德江、俞正声当选党的十八届中央委员会委员。

新闻：http://fmn.cc/ZwJd7y

视频：http://fmn.cc/UFadBT

14日中共十八大闭幕，并在傍晚时分发布了今日产生的中央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和中纪委委员的名单，虽然审查制度仍存在，但民众仍对十八大后中国高级官员的变动情况十分感兴趣，因为这些由少数人产生的领导人将决定中国未来五年甚至十年的走向。

新闻：http://fmn.cc/UFanZL

http://fmn.cc/PZdBpE

http://fmn.cc/Zyies5

15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发布第一次全体会议公报，其中列出了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副主席、委员，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副书记、常务委员会委员名单。《纽约时报》此前以“太子党的崛起”为题对一些新晋领导人的情况进行了报道。

新闻：http://fmn.cc/TKsKZ0

http://fmn.cc/UnHPOx



习近平等7名政治局常委在15日的中外记者会上露面，习近平发表了讲话，称要对党内腐败保持警惕，称要为人民服务，要以人民的美好生活为奋斗目标等等。媒体此前纷纷指出，将于明年3月上任的习近平时代大幕开启，但必须面对经济、贫富差距、党内政治等等一系列问题。

新闻：http://fmn.cc/TKsLfm

http://fmn.cc/TKtnS6

http://fmn.cc/TKt6ih

同时英国媒体还关注了即将成为中国国务院总理的李克强的成长之路，报道指出，在中国高层领导人中，他是英文最好的一位，谈不上流利，但很熟练。但在通向中国政坛顶峰的道路中，他似乎失去了不少理想主义色彩。

新闻：http://fmn.cc/UFbkl4

中共十八大召开前夕，世界最大网络搜索引擎公司谷歌9日表示，他们在中国的网络服务遭到大规模封杀。公司发言人宣称："我们经过检查确定，我们这一方没有任何问题。问题出在中国。"这些封锁导致用户无法使用谷歌的搜索引擎和电邮信箱。

新闻：http://fmn.cc/ZyhXpe

11月9日下午中共十八大第一次记者招待会上，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王京清给出数据，称中国共计8260.2万名共产党员，2011年底全国公务员人数为702.1万人，同时有98.3万户非公企业建立了党组织，他称这些党组织的建立是"顺应了企业职工的要求和愿望"。

新闻：http://fmn.cc/UF9eBq

海外媒体传说毛泽东思想有可能在这次党章修订中被修改或者被删除，对于这一说法，社科院党组副书记表示，毛泽东思想永远是党的指导思想，在党章中已经确定了它的历史地位，否认了传闻。

新闻：http://fmn.cc/UF9qAM



11月9日，**央视**中东中心站的记者冯韵娴在同演播室连线过程中出现失语，随后央视编造新闻的情况被网友揭露，成为网络热点。事实上出现在央视新闻中的报纸，其原标题是“中国警告腐败的危险”，还指出了今年以来备受关注的几件党内事件，但却被央视说成是中东媒体关注中国的十八大。

新闻：http://fmn.cc/ZyhXp1

最高人民法院常务副院长、党组副书记沈德咏等人参加了十八大新闻中心的网络访谈，讨论主题为“中国的司法公正”。沈德咏称中国的司法整体公正，在谈及办案效率慢的问题时，沈德咏举例称布鲁诺400年后才平反，认为中国办案效率不慢。

新闻：http://fmn.cc/ZOggmF

十八大期间，广电总局副局长表示，中国不存在“电影保护月”的问题，他称国外影片要避开国产影片，这是一种商业考虑。他还称中国要扩大影院数量，让更多的电影进入影院放映。同时，今年1至10月底，中国电影票房132.72亿元，同比增长40%，但国产电影票房只占41.4%，比去年同期有所下降。多年来国产影片占市场主导地位的局面受到了动摇。”

新闻：http://fmn.cc/Zyi9ES

茅台集团旗下的**习酒**在十八大期间的营销活动活跃，据悉该酒的广告在央视、北京的公交车甚至党政机关的内部投放，此前不太为人所知的习酒因与即将担任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的姓氏同名，而变得更加高调。

新闻：http://fmn.cc/ZckGV7

在十八大即将闭幕的时候，《经济学人》一则报道对1987年的中国党代会进行了追忆，认为当时中共对于媒体的开放态度可以称的上是“更好的时光”，赵紫阳手举酒杯走过记者面前，他们之间只隔了一个桌子。

新闻：http://fmn.cc/SiWCK5



重庆事件

重庆日报11月6日第二版消息，重庆市原副市长、市公安局原局长王立军，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和公职。报道指出，除了此前被控徇私枉法、叛逃、滥用职权、受贿罪，王立军还违反廉洁自律规定收受他人贵重物品，利用职权与多名女性发生或保持不正当性关系等严重违纪问题。

新闻：http://fmn.cc/RYPFxK

十八大的分组讨论会上，重庆市市长黄奇帆承认，事件发生之后，对重庆的投资，经济表现以及公务员的状态等都带来一定影响。而重庆市委书记张德江称根本不存在重庆模式，他还表示不知道薄熙来何时审判，这是司法问题。

新闻：http://fmn.cc/Ub9Qsw

14日《重庆日报》刊登了《重庆市实施国家安全法规定》，其中要求工作人员叛逃或者有被收买嫌疑的，要立即上报。报道称，这一规定是今年4月制定的，正是王立军在美国领事馆滞留事件发生之后，该规定已经于2012年7月开始实行。

新闻：http://fmn.cc/TDziq1

本周有报道指出，曾经中国著名的大连实德球队，因徐明的投资且战绩辉煌而被人们铭记，但其实徐明并非因喜爱足球才大笔投钱，只是为讨时任大连市领导的薄熙来的欢心。

新闻：http://fmn.cc/UnIEXF

藏人自焚事件

本周藏区的形势紧张，在11月7日和8日短短2天内，就有6名藏人因抗议当局的民族政策而自焚。众多的自焚者在青海省同仁县还引发了数千学生的抗议活动，媒体称当地政府加强了戒备。



新闻：http://fmn.cc/TwOLbc

本月在日本访问的**达赖喇嘛**12日在冲绳召开的记者会上，反驳中国政府指责他煽动藏人自焚的说法，表示中国政府应认真调查藏人自焚原因。他表示，“中国政府如果能对解决西藏发生的悲剧显示某种态度的话，西藏流亡政府是一贯持有欢迎姿态的。” 此前达赖喇嘛在冲绳发表了演讲，并为太平洋战争中的逝者祈福，他呼吁“将暴力作为解决问题的手段是错误的。”

新闻：http://fmn.cc/SWjthT

http://fmn.cc/SWjzpM

http://fmn.cc/W38IOs

藏人频频**自焚**，在熊熊火焰中，他们高呼口号，要求自由。但在中国主流舆论中未引起太大波澜，《纽约时报》文章称，几乎没有中国学者尝试探讨自焚这个话题，认为“这种沉默揭示出了藏族和多数民族汉族之间令人不安的鸿沟，尽管几十年的政府宣传试图把中国描绘成一个56个民族的和谐快乐大家庭。“

新闻：http://fmn.cc/Txfkzz

11月13日上午**达赖喇嘛**在日本参议院议员会馆发表演讲，据悉有140名国会议员参加。与会人员宣布成立“支援西藏议员联盟”。中国政府则再次表示了反对态度。

新闻：http://fmn.cc/SLn6VI

http://fmn.cc/SiW8Uq

中国新华社报道，11月12日在**青海省黄南自治州同仁县**的多哇乡，有2名藏族青年自焚。分别是23岁的宁卡扎西及20岁的宁加本。目前，中国当局已经展开相关调查。有消息称，同仁县目前已被控制，所有网络、电话等通讯管道以及电源等均被切断。

新闻：http://fmn.cc/UlIPUt



中国多所高校中的**藏人**教师和学生，及部分寺院的僧人在10月5日联署请愿信，要求改变现在的民族政策，尊重藏族文化，消除民族歧视以及资源掠夺等等。此前青海省要求藏人学校中推行以汉语为主的教学方式，引起了各地藏人学生和家长们的强烈不满。10月开始，多个藏区的学生上街抗议。

新闻：http://fmn.cc/SiXXRj

本周其他重点新闻

阿里巴巴在11月11日开展了购物狂欢节活动，12日凌晨公布数据称当天天猫商城和淘宝的销售额高达191亿元，这一数据是上一年促销活动的3倍，同时一些数据也令业界惊讶，比如超过217家天猫商城的店铺支付宝成交额突破千万，甚至有3家店铺营业额超过亿元。

新闻：http://fmn.cc/ZwJeYY

日本媒体报道称，于本月25日开跑的**北京国际马拉松**赛报名网站国籍栏中将“日本”删除，截至去年国籍栏中还是一直都有“日本”一项，这一情况导致日本选手无法报名。舆论压力下，“日本”一栏得以恢复，中国田协称北京马拉松未拒绝日本人参赛，拒绝的是日本马拉松爱好者的个人报名。

新闻：http://fmn.cc/ZOdkGB

http://fmn.cc/ZOe9iJ

武汉的媒体报道该市一所知名高校在运动会上取消了**长跑**项目，一是激起千层浪，各地的媒体也纷纷关注这一现象，结果显示，西安、南京、深圳等地多个大中城市的学校都因为学生身体素质下降、担心出现猝死情况，而取消了长跑的项目。

新闻：http://fmn.cc/SWD6Em

http://fmn.cc/SWCPRN



中文大学最新调查显示，**香港**人自认是“中国人”的比率只有12.6%，跌至16年新低。另外，有超过8%的港人抗拒国旗及国歌，这一比率也创下历年新高。不过人们更愿意承认自己是“香港人”，相信是今年以来由于中国因干涉香港事务，令港人感到不满而导致的。

新闻：http://fmn.cc/SGZLEa

11日晚开始，**吉林省**大部分地区和黑龙江省鹤岗市降下罕见暴雪。央视消息指出，至12日下午，**黑龙江省鹤岗市**降水量已达37.8毫米，积雪深度达31厘米，是50年来最强降雪。目前全市学生停课，部分城区停水停电。

新闻：http://fmn.cc/UxvCg7

http://fmn.cc/UxvrBD

11月11日，在**天津市**滨海新区东南部的北大港湿地，护鸟志愿者们进行巡护时，发现在那里觅食的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东方白鹳集体中毒，数量超过30只，目前死亡的东方白鹳已上升到21只，另有13只中毒较重的东方白鹳被救活。最新消息显示，这些东方白鹳可能遭人为投毒，因为在保护区内发现了3处人造毒池。

新闻：http://fmn.cc/TxGl6a

http://fmn.cc/ZOfPJ9

11月13日上午11时许，**合肥**安医二附院北楼13楼泌尿科内，一男子持刀将护士砍伤。随后警已经赶到现场，行凶男子被警方控制。据悉，一名护士长因伤势严重抢救无效身亡。另外有4人被砍伤，其中两人为重伤：一人背部被砍，失血过多；一人胳膊被砍，正在手术抢救。其余两人伤势较轻。

新闻：http://t.cn/zjzVjaB

http://fmn.cc/UlgT1H

11月10日上海女排两名队员表示，前一晚该队一名副教练借为她们放松按摩名义对他们进行性骚扰，上海体育局14日发布消息，这名教练被指酒后存在不轨言语和行为被暂停带训工作，市体育局将进一步调查处理。

新闻：http://fmn.cc/ZOgdHw

http://fmn.cc/ZOgkD5

【返回目录】

此电子周刊由『我在中国』（Co-China）论坛志愿者团队制作，『我在中国』（Co-China）论坛开始于 2009 年 8 月，每月在香港举办一场公开讨论，并借助网络视频直播、文字直播等方式将现场放大至全球任何地方。我们希望提供独立、客观、理性的观点和论述，并关注被主流媒体忽略的议题和讨论。目前已举办二十三场讨论，嘉宾有艾未未、长平、陈冠中、贺卫方、胡泳、梁文道、欧宁、潘毅、叶荫聪、周保松、许宝强等。2011 年 6 月开始，为了丰富论坛的主题，我们在固有论坛的基础上开始一个 Co-China X 系列，这些讨论、沙龙由 Co-China 同一些友好团体合作举办，试图将更多有价值的讨论呈现于网络。　论坛网址：https://cochina.org/

若希望订阅此电子周刊 doc 版本请发一封空邮件至 cochinaweeklydoc+subscribe@googlegroups.com。

若希望订阅此电子周刊 pdf 版本请发一封空邮件至 cochinaweeklypdf+subscribe@googlegroups.com。

若希望订阅此电子周刊 mobi 版本请发一封空邮件 cochinaweeklymobi+subscribe@googlegroups.com。

若希望订阅此电子周刊 epub 版本请发一封空邮件 cochinaweeklyepub+subscribe@googlegroups.com。

也欢迎大家转发分享。

若希望想加入“我在中国”（Co-China）论坛的志愿者团队，请发简历和个人陈述（说明希望加入志愿者团队的原因）至 forum@cochina.org。

论坛网址：https://cochina.org/

论坛 twitter：Co-China 论坛（http://twitter.com/#!/CoChinaOnline）

论坛新浪微博：1510 周刊（http://weibo.com/1510weekly）

编辑：丁昕　刘垚　童亚琦

校订：夏景

主编：方可成

配图：潘雯怡　周梦蕾

技术支持：毛向辉、冯自强

出品人：杜婷

